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

极左哀秋 (1973-1976)



红旗出版社

K27
36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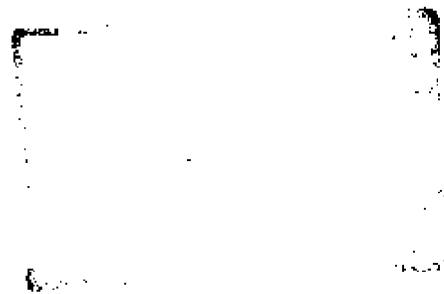
879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

极左哀秋

(1973—1976)

● 张丽波 于德宝



红旗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8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

极左哀秋(1973—1976)

编 著 者 张丽波等
责任编辑 刘玉成 封面设计 李俊华
出 版 红旗出版社(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印 刷 北京市通县长凌营印刷厂

787×1092 32 开 6.75 印张 152 千字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80068—593—4/K·26

定 价:6.00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袁纯清	李惠让	宇 剑
副主编	苗丹国	李 良	张丽波
	张彦周	喻中春	李春祥
	李 勤		
编 委	苗丹国	李 良	张丽波
	王 钥	吕廷煜	韩莺红
	王志明	杨志玲	刘 烁
	鹿远征	汪 闲	于德宝
	王炳林	徐付群	李 勤
	朱秀婷	杨灵霞	詹来宇
	喻中春	李春祥	张彦周
	吴 涛	李登华	
总策划	张春林	孙卫珏	易德炜

前 言

迄今为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 44 年的辉煌时光写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英雄史诗，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中划时代性的伟大而灿烂的一章！

回溯这一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我们仿佛听到了历史老人轰隆的足鸣声！

开国奠基、凯歌行进、艰难探索、曲折发展、内乱骤起、风云激荡、极左哀秋、改革扬帆、闯关奋进、大潮涌动……

44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二、三代领导集体率领勤劳而勇敢的中华儿女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树起了一座光耀九洲、泽及万代的不朽丰碑！

中国人民的确站起来了！

历史的雄伟卷帙尽在一页之中，这一页写着正面的辉煌和负面的曲折。

因为年轻，她也会有令人不堪回首的失误；为了论证一个普通的真理，有时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前进的顿挫中，她与儿女一起沉思……

直面这震古铄今、博大庄严的丰富画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驱动了我们这些年轻史学工作者那尚嫌稚嫩的笔端……

于是，便有了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丛书——一套用纪实手法真实、准确、全面、深刻地再现共和国风云历程的丛书。

我们本着“写历史要严格尊重事实，流芳百世的业绩无须粉饰”的格调展开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写作。我们有过动情处的慷慨激昂、辉煌处的激扬文字、愤怒处的拍案而起、顿挫处的伤心落泪……春夏秋冬，我们终于把我们的热心和激情一起奉献给了亲爱的读者。

我们坚信，迄今为止的共和国历史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骄傲的宝贵财富，是培育一代又一代龙的儿女的不可多得

的优秀教材。

历史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幅预言长卷。

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

愿你、我、他共同拥有、倍加珍惜这份热情！

本书编委会

1993年8月

目 录

一、“三箭齐发”人心寒

——“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 1.1 毛泽东提出“批孔” (2)
- 1.2 “三箭齐发”掀巨浪 (10)
- 1.3 “放火烧荒”人心寒 (18)
- 1.4 反“复辟回潮”与“反潮流” (24)
- 1.5 “影射史学”射向谁? (38)

二、“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不满江青始末

- 2.1 “宁长社会主义的草……” (49)
- 2.2 “不见还好些”“多见何益?” (50)
- 2.3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 (52)
- 2.4 “她算上海帮呢!” (53)

三、一场流产的“政变”

——“组阁”风波风云录

- 3.1 大造舆论为哪般? (55)
- 3.2 “风庆轮”事件的烟幕 (59)
- 3.3 长沙诬告风雷激 (62)
- 3.4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67)

四、东山再起挽狂澜

——邓小平复出、整顿始末

- 4.1 邓小平第二次出山…………… (75)
- 4.2 东山再起挽狂澜…………… (83)
- 4.3 “反对经验主义”的背后…………… (97)
- 4.4 评《水浒》，直射周、邓…………… (106)

五、打不倒的巨人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始末

- 5.1 “反击右倾翻案风”…………… (112)
- 5.2 “教育革命大辩论”…………… (116)
- 5.3 巨人，在风雨中屹立…………… (119)

六、洒向神州都是泪

——巨星陨落备忘录

- 6.1 夕阳笼罩在西花厅…………… (127)
- 6.2 忍辱负重为中华…………… (128)
- 6.3 西花厅，让我再看你一眼…………… (130)
- 6.4 拥抱死神，力挽狂澜…………… (131)
- 6.5 “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 (134)
- 6.6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 (136)
- 6.7 讣告一声天下惊…………… (139)
- 6.8 “恩来，恩来在哪里？”…………… (142)
- 6.9 “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 (143)
- 6.10 “花开花落两由之”…………… (145)
- 6.11 “我虽未盖棺也快了……”…………… (147)
- 6.12 “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148)

- 6.13 巨星陨落惊天地…………… (149)
- 6.14 洒向人间都是泪…………… (150)
- 6.15 “我不赞成把它改掉”…………… (153)

七、为了忘却的记忆

——唐山大地震备忘录

- 7.1 地震局,你怎么啦?…………… (156)
- 7.2 “震中呢?震中在哪里?”…………… (159)
- 7.3 不堪回首“7.28”…………… (160)
- 7.4 “唐山来的,到国务院报警”…………… (162)
- 7.5 生命大营救…………… (163)
- 7.6 形形色色的受震者…………… (165)
- 7.7 魔鬼的笛声犹然蜂响…………… (167)
- 7.8 国际地震预测界的震荡…………… (168)
- 7.9 “中国拒绝外援”?!…………… (169)

八、扬眉剑出鞘

——“四五”运动纪实

- 8.1 天惊一声雷,信时心已碎…………… (173)
- 8.2 来自四面八方的怒吼…………… (175)
- 8.3 第一个风暴眼…………… (177)
- 8.4 南京,不可阻遏的呐喊…………… (179)
- 8.5 不平静的紫禁城…………… (182)
- 8.6 清明节前雨纷纷…………… (185)
- 8.7 异乎寻常的清明节…………… (188)
- 8.8 4月5日:200人被捕…………… (196)
- 8.9 寒风中的挺立…………… (199)

8.10	最高中枢的决断·····	(200)
8.11	华国锋升迁“二号人物”·····	(201)
8.12	天安门,不相信眼泪·····	(201)
8.13	更为猛烈的“批邓”·····	(202)
8.14	千古奇冤,冤冤有解·····	(203)

一、“三箭齐发”人心寒

——“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后，“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毛泽东采取种种措施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凭借他们在党的十大上所窃取到的权力，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在这一阶段里，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篡权与反对篡权的斗争非常激烈。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恶劣的手段和一系列卑鄙的行动，他们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一个严重的步骤……

“三箭齐发”，硝烟难弭！

1.1 毛泽东提出“批孔”

1971年9月以后,全党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揭发批判。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解决由于林彪一伙破坏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全国形势明显好转。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搞反革命两面派,披着极“左”的外衣,在非常“革命”的口号下,制造分裂,颠倒敌我,否定一切。他们高喊“革命”口号而猖狂反党反人民,妄图打倒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因此,批林整风开始后展开的批极“左”,批假“左”真右,就等于撕开了“四人帮”的“左派”画皮,捅到了他们的心窝子上。“四人帮”十分恐慌,江青叫嚷“批林整风都整到我们头上来了!”“四人帮”的一些死党也嚎叫:“陈伯达倒了,必然要炮打张春桥、江青同志。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为了掩护林彪,隐蔽自己,“四人帮”悍然下令:不许批极“左”,不许批形“左”实右。他们以攻为守,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大搞假批孔,把矛头指向人民敬爱的周总理。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下令梁效进驻林彪住宅毛家湾,编辑所谓批林材料。梁效对林彪的大量罪证不感兴趣,从大量材料中抽出一些林彪肯定孔丘、孟轲某些言论的零碎材料,上报毛泽东。江青事前向梁效面授机宜,说是搞材料要从现实的斗争需要出发,为了这个需要,选材料就是寻找诸如孔孟之道之类的题目来转移斗争大方向。

毛泽东见到从林彪住宅搞到的肯定孔丘、孟轲某些言论

的材料，由此想到了“批林批孔。”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当时流传到社会上：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

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孔问题。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说：

“郭老在《十批判》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外交部，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出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不久，又传出毛泽东写的一首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据说,毛泽东在8月5日给江青读了这首诗,同时,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别有用心地提出将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不要马上公布,“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历史上的儒法斗争问题,并借古喻今。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月13日,又登载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一文。这些文章,迎合了江青一伙的需要。9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及副总统沙菲,谈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关于儒家和法家的评论,很快为江青一伙所利用。

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这个大批判组有30多人,名义上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实际上由江青亲自指挥、直接控制。直至1976年10月,这个大批判组共撰写文章200多篇,公开发表的有181篇,其中有30多篇是江青、姚文元直接授意的,都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这个大批判组有十几个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它除了享有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优先发表文章的特权外,还直接把持了《北京大学学报》,并一度控制《历史研究》。

与梁效相呼应,南有罗思鼎。9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这个写作组是张春桥、姚文元的写作班子,正式成立于1971年7月。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这个写作组以罗思鼎、康立、石仑等笔名在《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左倾文章,这个工作组还进行了大量的反动活动。写作组的头头说:“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每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一块我们的墓碑。”9月27日,中央党校写作班子以唐晓文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文,这个写作班子也是“四人帮”的舆论工具。

在“四人帮”的操纵下,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法批儒的文章。9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焚书坑儒”辨》。这篇文章说:“‘焚书坑儒’就其性质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反篡权复辟的‘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效果,也是应该肯定的。”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0期发表《论尊儒反法》,这篇文章说:“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11月1日,由罗思鼎撰写、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这篇文章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这期杂志还发表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文章说:“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

子,也都是尊孔的。”“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11月16日,《学习与批判》第3期发表《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这篇文章说:“延续了2000多年的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继续进行着。”为“四人帮”揪“现代大儒”制造舆论。江青谈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后,得意地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批韦,吕是个宰相。”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对周恩来的险恶用心。在《学习与批判》第4期上发表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中,说什么“丞相田千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

1973年11月,毛泽东根据不可靠的消息,误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批评周恩来。事情是这样的,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会谈不久,翻译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时谈到: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

毛泽东误信了翻译的话,认为周、叶对美国右倾投降。针对这件事,毛泽东于11月17日对少数人这样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圈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泽东。按当时的讲法,

中共历史上有过 10 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依次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听了江青的指责，周恩来平静地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但内心不安：与基辛格的会谈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难道对毛泽东的意图理解错了？难道在会谈中真的出现了右的偏差？翻译可以抢先直接向主席汇报情况和个人的看法，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开展工作呢？

1973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分别与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他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这是指 11 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着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第一个“他”是指周恩来，第二个“她”是指江青。毛泽东虽然在某些方面不满意周恩来，但他并不认为周恩来会“迫不及待”。毛泽东没有无条件地支持江青，他对江青是了解的，只有江青才会“迫不及待。”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讨论由他提出的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话，12 月 13 日、14 日和 15 日又同政治局的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了话，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又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讲话喜欢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

想。

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的命令。同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一届二中全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两年多，毛泽东又重提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是针对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的。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克服江青一伙的破坏干挠，坚定地推进“批林整风”运动，力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极端作法，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保护老干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与对外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江青一伙深怕“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会把他们的狐狸尾巴一齐揪出来。所以他们极力干挠破坏“批林整风”运动，极力制造事端，攻击污蔑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问题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这从本质上说，是1967年2月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根据周恩来几次讲话的精神，《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发表了一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当时，在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授意《文汇报》搞了期《内参》上送，说《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1月，外交部和中联部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

报告,其中提出要以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为会议的中心内容。这个正确意见,得到周总理的批示同意。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却攻击反对。张春桥说:“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江青说:“我个人认为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还要“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对批林性质的认识分歧很大,最后由毛泽东裁决。毛泽东从他晚年的“左”倾错误理论出发,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12月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给江青一伙壮了胆。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此以后,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批林彪的极“左”。江青一伙乘机大批所谓“右倾回潮”,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邪路。

联系这个背景,毛泽东对周恩来有些不满,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出“批孔”问题,就不难理解了。而江青一伙正是利用这一点,认为时机已到,组织写作班子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作为批判林彪影射周恩来的弹药。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元旦献词》,社论说:“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

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社论明确提出继续批判“尊孔反法”，批判“修正主义。”

1974年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1号文件下发。于是，“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从上述事实看出，“批孔”是毛泽东提出的。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则利用这一点，制造了一系列事端，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1.2 “三箭齐发”掀巨浪

中共十大虽然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和严重罪行，但却全面肯定和继承了中共九大的错误指导方针，使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得以继续下去。更为严重的是王洪文被提拔到了接班人的地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窃取了更大的权力。江青一伙的野心急剧膨胀，他们急于寻找机会打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篡夺党政大权。江青等人利用清查林彪的机会，在林彪家中找到了一些摘录的孔子和儒家著述的语录条幅和卡片，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等。于是，便认为林彪是孔孟之道的信徒，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江青一伙指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整理了一份资料，取名叫《林彪与孔孟之道》，送给毛泽东。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毛泽东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指示。

王洪文 江青

1974年1月12日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下达。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反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批林批孔”是借题发挥，实质要解决现实问题。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防止“右倾翻案”，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江青一伙目的是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篡夺最高权力扫清障碍。

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后，报刊发表了许多“批林批孔”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批林批孔”的真正意图。

1974年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广泛深入开展

批林批孔的斗争》，短评说：“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就是当前全党的大事，全军的大事，全国人民的大事。不批林批孔，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是放弃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这样下去，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

“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因此，要深入批林就必须批孔，批孔正是为了深入批林。只有通过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人民日报》2月2日发表的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中说：“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人民日报》2月20日发表的社论《批“克己复礼”》中说：“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总之，要通过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广泛深入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各项工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在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著。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理解反对修正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的长期战斗任务,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人民日报》3月15日发表的社论《再批“克己复礼”》中说:“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江青一伙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一方面积极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维护“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搞阴谋诡计,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他们的意图是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1月24日、25日,是农历正月初二、初三,正是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江青反革命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擅自召开了在京军队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

1月25日上午,小轿车、吉普车、面包车,一辆接一辆地来到首都体育馆的广场上,人们像潮水般涌进会场。

江青俨然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在会上出现,昂首挺胸,颐指气使,一些人象众星捧月似地围在她的身边。江青端着架子,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派头。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1974年第1号文件为“王牌”,临时通知周恩来主持“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面无表情的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上,他不知道今天大会的内容,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匆匆赶来的。会上,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丑——迟群和谢静宜成了主讲人,在台上一唱一和演双簧。江青不时插话,指手划脚,点这个,批那个,使会议气氛紧张,整个会议充满了火药味。

“革命的同志们！”江青故意拉着长腔，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声嘶力竭地大声喊道：“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地联系实际。”突然，她挥舞了一下拳头，嗓门提高了八度，喊道：“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她停顿了一下，又说：“现在由谢静宜同志讲话。”

谢静宜原来是 8341 警卫部队的一位搞机要工作的人员，到北大支左留下来当党委书记，一下子成为风云人物。她和迟群成为北大、清华的“太上皇”，是江青的心腹。

谢静宜和迟群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含沙射影，杀气腾腾。

在这里摘引一些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

谢静宜：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百页，当时只有两三百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指示啊，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迟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批孔中，批林中结合批孔，要从阶级立场、阶级根源，阶级就是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从哲学的观点，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等方面来

认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关系,这样才能深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挖他们的祖坟,挖他的这条路线的老根,把林彪散布的反动谬论批深批透。通过批林批孔,将使我们进一步地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同几千年来的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获得思想上的解放,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反对帝修反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迟群:深入批林批孔,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防修反修的一个战略措施,所以它是贯彻“十大”的问题,是深入批林、批修、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所以,这些信,它本身关系到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整个革命队伍的建设,关系到我们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支持和保护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理解、正确地解决本单位、本地区至今还在那里扯皮的问题,关系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准备打仗的问题,关系到各级领导如何敢于抓大事的问题。……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不正之风,风气不正,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什么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抓得不够。

谢静宜: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席叫我们抓大事,我们体会到就是抓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党的大事,阶级的大事,一句话,就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

纲来的大事。因此，这就不是孤立地给某一个领导同志，某一个单位写信的问题，而是给全党全军全民写的信。也不是孤立的在批孔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继续深入，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防修反修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问题，也就是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

谢静宜：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坚持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革命的精神是斗出来的，革命的事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斗则退，不斗则垮。

迟群：不斗则修。

姚文元：……第一，我们今天就要有毛主席横渡长江那一种迎着风浪前进的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搞到底。……另外一个呢，主席这个气魄大，主席是迎着风浪前进，这个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主席提到孔子说是逝者如斯夫。孔子是个着眼于已经死亡阶级的人，一个反动派，主席藐视他，嘲笑他，批判他。所以这里一面表现了主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面批了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学习主席这一种反潮流的精神，横渡长江的精神，把这一场批林批孔的仗，认真地发动广大群众打好、打胜。

（当中联部政工组宣传组李宪魁讲到部领导不让印北大的材料时）江青：给你们送去。

会上，他们还提出批判“走后门”问题。他们提出批“走后门”，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会上，江青还阴阳怪气地让周恩来讲讲，周恩来听了江青一伙的肆无忌惮地发言，感到这次大会是江青背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布置的，矛头是指向自己和负责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同

志。周恩来镇定自若地说：“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接着说：“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

会后，江青哈哈大笑，“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大会一结束，她把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谢静宜、迟群召集到钓鱼台，大言不惭地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她得意忘形，说：“今天是我们的庆功宴，把周恩来搞得狼狈不堪，他这个庞然大物，也得在大庭广众面前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照样是咱们的手下败将。”她举起酒杯，“来，为我们两位有功之臣小谢、小迟，干杯！”

王洪文频频同江青碰杯，奉承道：“周恩来是我们长期较量的对手。江青同志是指挥我们的统帅，你就统率我们和他周旋到底吧。”老谋深算、老奸巨滑的张春桥，是“四人帮”中的军师，他插言：“我们要防备他从背后捅刀子。王、关、戚是怎么垮台的！我们要注意。”

三杯酒下肚，江青有些飘飘然了，“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眼下，鹿死谁手，就看我们两家了。从年龄、身体上，他都不占优势，他今年已经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好景不长了。他有点象诸葛亮死前的处境，后继无人。而我们是兵强马壮，我的年龄比周恩来、叶剑英还小十六七岁，至于洪文、文元，属于少壮派！我们要有信心战胜他们。”她说到激动处，站起来，一挥手，“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正当江青一伙修改整理讲稿、录音带，准备下发时，为毛泽东所制止。

“一·二五”大会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吩咐参加大会的

秘书把大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秘书们连夜突击,到1月26日上午,就把记录整理好了。周恩来把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划了横杠,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装在了一个大信封里,立刻派机要通信员送给了毛泽东。

当天下午,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他越看越生气,在她眼里还有谁,谁也不在话下了,竟背着政治局,背着我,连个招呼也不打。她自以为翅膀硬了,可以一手遮天了,这完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1月30日,叶剑英也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自己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看法。2月15日,毛泽东对叶剑英的来信作了批语,“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中央扣留了江青一伙精心炮制的准备散发到全国的“一·二五”大会的录音带。后来,毛泽东把“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叫作“三箭齐发”。

江青不甘心失败,下一个阴谋又在她心中酝酿了。

1.3 “放火烧荒”人心寒

军队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它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绝对的优势。江青对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恨之入骨。她一直忧虑:虽然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从表面上看,军队是自己和周恩来平分天下,但一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占着绝对优势,张春桥在里面是孤掌难鸣。

江青对未来的决战,充满矛盾,担心军队不站在自己这边。她要千方百计抓军权。一天,她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找来议论下一步的打算。

张春桥说：“我虽然名义上是政治部主任，执掌着全军的人事大权。但在任命重要领导干部上，我一点权也没有。军委常委一开会，他们是多数，人又熟悉，背后又有周恩来的控制。我是一个光杆司令，抗衡不了他们。军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是我们致命的弱点。”

江青反剪着双手，踱来踱去，说：“我们搞第二武装吧，造反派还是听我们的话的。”

“对！”王洪文点点头，“把民兵组织起来，发枪支弹药，要现代化的，机枪、大炮，甚至火箭要齐备，进行军事训练，到关键时刻，一声号令，就能拉出去与叶剑英的正规军决一死战。”王洪文手舞足蹈，自己俨然是一个总司令了。

江青接着说：“我们要两路进攻，不能让叶剑英安静了，要放火烧荒，鼓动军队的造反派闹腾一下。”

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江青一伙要篡党夺权，自然要极力抓军权。可是，军队不听江青的，对她来说是一块“荒地”，她就企图利用“批林批孔”这把火“放火烧荒”，把这块地盘夺下来。

她从1月13日起，接二连三地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人给某部防化连送材料，还派了一些无军籍的记者到部队为她搜集“批林批孔”的情报。

她给空军司令员马宁写信：

马宁同志：

听说，空军批林批孔有些困难，请苏元勋同志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各100本，可能有助于批

林批孔。苏元勋同志一向受林彪死党吴法宪的压制，“九·一三”以后才引起大家重视，托他去传达，请指定一个连队，请苏元勋同志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告苏元勋同志转告我。

江青

1974年1月13日

她还给二十军防化连写信，派迟群、谢静宜送到浙江。还给海军政委苏振华写信。

1月24日，江青竟然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请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来看，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200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1份，供同志们参考。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1974. 1. 24

1月28日,江青又给“洪文、剑英、春桥、小平、锡联、振华同志”写信,并“请转世友、紫阳同志”。江青俨然凌驾于中央军委之上,插手军队,搅乱军队。

王洪文、张春桥与江青紧密配合。2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对我军高级领导机关大扣帽子、大打棍子,他们说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

3月5日晚,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江青以听取汇报为名,把矛头对着人民解放军。

江青说:“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她为了整军队,给军队捏造了种种罪名:“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不许普及样板戏”、“有错误批评不得”、“我们的话根本不听”等等。为了整军队,她诬蔑攻击我军各级领导干部,骂这个是“军阀”,骂那个是“坏人”。1973年9月,中央领导同志观看部队文艺演出,并接见了各单位领队,江青为了突出自己,挤在两位党的副主席的前面。一位部队负责同志在向大家介绍中央领导

同志时，没有在介绍党的副主席之前介绍她，她就一直怀恨在心。在3月5号的讲话中，江青又提及了这件事，“这个人怎么那么对我有刻骨仇恨，”“不是个好人。”她还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军队各级领导，“他们这些人都是做坏事的。”她叫嚷：“看来要夺权。”指示被召见的人：“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有三个人，去放火嘛。”她扬言要管军队，说：“我是有军籍的嘛，我已经去领军装了。”

江青发出“放火烧荒”的号令后，“四人帮”及其爪牙们便一齐上阵，煽风点火，推波助澜。3月6日，王洪文窜到总参，叫喊要揭开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3月13日，张春桥在听取总后勤部汇报时说：“不要怕派性。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3月15日，王洪文攻击总参是“维持会”，说什么，“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3月17日，陈亚丁擅自召集驻京部队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3月5号的讲话，布置在军队“放火”、“夺权”，他说：“江青同志要我回到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四人帮”“放火烧荒”的一个突破口是破坏《解放军报》。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三版《党的生活》专版中，刊登了一篇不足一千五百字的短文，题目是《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篇短文介绍了空军某厂党委，按照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教导，搞好党委团结的经验。这篇文章，也体现了周恩来、叶剑英1973年在空军一次党委会上讲话的精神。江青一伙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不满，江青说：“要到《解放军报》去几个人，我气得很。”张春桥说：“《解放军报》1月17日有篇文章，怪得很，你们可以写文章批评。”王洪文说：“这篇文章很坏。”他们通过亲信，派人到一个连队提刀代笔，盗用连队战士

的名义，给《解放军报》写了所谓“揭发信”。姚文元批示道：“告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王洪文下令：“解放军报社组织群众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战士的来信，要发动群众揭开报社阶级斗争的盖子。”

此后，他们接二连三地对军队找岔子、扣帽子、打棍子。今天指责宣传某个连队的报道是“和中央唱反调”，明天批评把两条批孔新闻摆在一个版上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江青特别交代一个连队，要“眼睛盯着《解放军报》，挑他们的毛病。”他们还公然破坏中央关于稳定部队、部队基层单位不搞“四大”的规定，唆使一些人以连队名义轮番到军报社贴大字报。他们对军报上下夹攻，内外夹攻，百般刁难。到三月中旬，他们见时机成熟，就由张春桥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令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在五个多月中，《解放军报》被迫变相停刊了。

江青一伙之所以抓住军队的这篇短文大做文章，其用心就是借此来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1973年5月，空军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后，整顿了党委领导班子，周恩来和叶剑英在空军党委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党委要讲团结，不要搞一言堂，不要称霸。军报发表的这篇短文体现了周、叶的讲话精神。周、叶那次在空军讲话时，江青等人在场。因此，张春桥在策划炮制“批评意见”时，阴阳怪气地说：最近“又有什么人讲了什么话”，含沙射影地向有关人员暗示，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周恩来。他们历来把周恩来看作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打击、陷害周恩来。

江青一伙在军队中的猖狂活动，一时乌烟瘴气。他们这些活动很快被中共中央觉察了。3月20日，毛泽东对江青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这样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3.20

第二天，王洪文、张春桥带着那个奉命夺权的陈亚丁，当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面，演了一出掩盖抵赖、丢卒保帅的丑剧，由陈亚丁承认是自己乱说乱传，把江青到军队“放火烧荒”的罪行保护了下来。这场闹剧也就收场了。

1.4 反“复辟回潮”与“反潮流”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制造了所谓“复辟回潮”和“反潮流”的典型，为攻击周恩来等人提供“现实根据。”

1973年9月8日至11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及有关高等学校负责人98人。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在会上作了《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并说不光文科院校要批孔，各类学校都要批孔，要把批孔与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结合起来。迟群在会上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10月11日至23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143人。会议总结交流了

搞好学校批林整风和教育革命的经验,研究了按照“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组织教学工作,进一步搞好开门办学,使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使学校同社会建立广泛和密切的联系等问题。迟群在会上讲话,说教育战线出现了种种“复辟”、“回潮”现象,“要警惕老的在新形势下复辟,”要警惕修正主义,要防止复辟。他提出,要抓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教育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他并为科教组在9月召开的批孔座谈会辩解:“科教组开的那个批孔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并说:“反对批孔,就是复辟。”

在教育领域,他们反“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吹捧白卷大学生,鼓吹“朝农经验。”

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人打着“反击修正主义”的旗号,在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又称“3个月运动”。他们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乱扣“裴多菲俱乐部”、“自由论坛”、“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等大帽子。派人进驻教研组和一些系,搞什么“揭盖子”、“夺权”、“占领阵地”,搜查打击怀疑的对象。在这次运动中,被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的教职工有64人,被点名批判的有403人。迟群还以“秦怀文”的笔名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学校师生员工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对“教育革命”和“两个估计”的抵制说成是在教育界“出现了一股翻案风”、“搞反攻倒算”,说知识分子队伍中“暴露了一小撮右派”,提出要“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进行“反击”。迟

群在清华大学发动的“反右倾回潮运动”不仅对清华大学，而且对于其他高校起了恶劣的影响。

为了达到“反右倾回潮运动”的目的，江青一伙大力培植、大力支持有“造反”精神的冒尖人物，树立了一些“反潮流”典型。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降职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爱人是炊事员，家庭经济比较拮据。在“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李庆霖的子女到了福建最贫穷的山区插队，生活也很难。李庆霖于1973年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自己的处境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毛泽东复信，把李庆霖誉为“反潮流”的代表，并馈赠人民币300元。毛泽东的复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李庆霖一下子成了反映民意的英雄。江青一伙便利用之，对李庆霖进行不切实际的宣传。李庆霖在宣传面前飘飘然，在1973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谈反潮流》的文章，以“反潮流”英雄自居，论述了毛泽东所说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示要用反潮流来“扬名千古，流芳百世。”

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一心想上大学。1973年4月3日，国务院转批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坚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伙看到《意见》，大为不满。与江青一伙勾结在一起的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的实权派

毛远新从辽宁上京，与江青一伙密谋。他们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并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要毛远新在辽宁开刀。正好这时候，张铁生参加了1973年高等学校6月份的招生考试。在理化考试时，张铁生只答了化学部分第一题中的六道小题，只得六分。面对理化考卷，张铁生干瞪眼，自知录取无望，他想到在公社文化考查时，给领导写的乞求上大学的信或许起点作用，于是将准备好的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抄录在理化试卷的背面，表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7月10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时，谈到一个小队长答不上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令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毛远新得到信，立即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语发表，同时派人调查，得出“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经过毛远新删改的张铁生的信，“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8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加以转载，并发表了评论，把张铁生吹捧为“路线觉悟高的‘卷’反潮流英雄。”张春桥大加喝彩，说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狂叫：“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

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则被奉为“反潮流”的“英雄”。这个被老师评为基础知识太差、没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张铁生，被破格录取到某农学院，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学生。他在“批林批孔”中被江青一伙利用，成了一块“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也成了一个人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但可以平步青云的恶劣典型。

江青一伙在反“复辟回潮”中，还制造了一个小学生事件。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语。小学生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黄帅的信和日记是她和班主任闹矛盾后，家长让她写的，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断章取义摘编的。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迟群、谢静宜看到后，即接见了黄帅，谢静宜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语发表。按语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教育路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编者按语“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28日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与《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再加编者按语。《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

开火”，并提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革命师生和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教育，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大量传播《人民日报》编者按等材料。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也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一些学校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

对这种作法，许多群众不同意、不赞成，提出了看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报道员邢卓3人，以“王亚卓”为笔名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在“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并加编者按语说：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发表后，有人很看不惯，出来指责。”这件事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黄帅的信发表前，经迟群、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看过，迟群在王亚卓的信上批道：“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江青对标题作了修改，并提出：“版面排突出些，生动活泼些。”黄帅的公开信发表后，王

文尧、恩亚立、邢卓被诬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遭到批斗、隔离审查，下放连队劳动。

一个12岁的小学生被树为“反潮流英雄”，虽然人们普遍怀疑这个“典型”的真实性，但没有人认为是小学生的责任。“来信和日记摘抄”抛出后，北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当时就给小学生写信，要她“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是些什么玩艺？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严肃地指出此事是背后有人导演的。正是如此，在这个事件中，小学生是无辜的，是受害者，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罪行在江青一伙身上。

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把周恩来的心血耗干了，使他心力交瘁，他的生命的旋律已接近尾声，他患了癌症。从1972年初，周恩来就便血，他渐渐地老了，消瘦了，憔悴了，他的两鬓已经斑白，脸上、手上生出了许多老人斑。此时的周恩来，得知自己患有癌症，生命有限了，因而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少则一、二小时，多则三、四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不合眼。面对敌手，他想到的是九亿中国人民，为了稳定全国局势，他忍辱负重，带病日理万机。但是，江青一伙却心毒手辣，向周恩来射出一支支暗箭，他们利用张铁生、黄帅等“典型”，在教育战线上大作文章，不停地向周恩来发难。

张铁生《答案》一文出笼不久，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搞到一份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个毕业学员的《谈话记录》，谈的主要是毕业鉴定后的一些想法和面对分配的思想斗争。他们删改了《谈话记录》，弄成一篇反对“智育第一”的材料，并让已工作的那位学员签名同意。他们以此展开讨论，说《谈话记录》“提出来的问题，不仅对师大适用，对上海其它大学也适

用：不仅对大学适用，对中小学也适用，不反仅教育战线适用，对其它如文艺、出版、新闻、体育、卫生等上层建筑、思想文化领域都有普遍意义。”经张春桥审定批准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为此写的编者按语，1973年11月21日发表，在上海进行了大讨论，讨论了三个多月。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与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中，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提出不要看不起“儿童团”，他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毛泽东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他还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谈话，演出了一场“考教授”的闹剧。在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曾恬不知耻地提到考教授的事情。

谢静宜：不要盲目的迷信一些专家权威。就从考试一些教授来看，就破除了这个迷信了嘛，东北就考过嘛，而且这一次，北京市去年年底三十号，当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集会议，上午，完了之后，就在清华出题，出完了下午五点钟到北京市集合二十辆小车，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试，当时我们说的是开座谈会，到那个时候啊，他们还真拿着笔记本，还认为开什么座谈会。我们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这么一考啊，六百一十三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及格的是五十三名，占百分之八点六，不及格的是五百六十名，占百分之九十一一点四，还有二百名教授、副教授是交了白卷，打了零蛋的。其中还有两所学校都是考零的。还有些学校是平均零点一分、零点四分的，就是因为有那么一

个教授大概考得好些,其他教授不好,那么一平均,还有零点一分、还有零点四分。

迟群:有一个单位是六人教授平均一个人一分,原来是有一个教授答了六分,其他是零分,所以一平均一个人一分。

江青:这个我还得要讲一下,有一些教授啊,他答不出来啊,是应该谅解的,因为他多年不搞了,多年不搞了,但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啊。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我呢,也冒了冒失,我也不知道谁搞的,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说这是大好的事情,后来不是说东北也不对嘛,东北考教授的这个人,他自己本人就是大学生,他自己先考了,结果他有几道题答不上,他说我总是个大学生吧,他这样考了教授。那么北京考了,北京考了,这两次考都有缺点了,说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上海考的时候出了社会科学的题目了,你连基本路线都答错了,另外……

姚文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

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是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

姚文元:几大特征。

谢静宜:还有答基本路线是三要三不要。

江青:哎,基本路线他说是,不是,还有多快好省,总路线有的说是三要三不要。

姚文元:有的说是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的。有一位教授写了一首诗,我想也是暴露嘛,孔孟之道的危害啊,说,突闻考试

实担心,突然闻到考试,实在心里害怕了,此事当年害学生,这件事情当年害学生,指的从孔夫子下来害了多少人,搞资产阶级呀,修正主义呀,苏修那一套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今天临头我尝到了这个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从现在开始要象,现在是谁,以张铁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江青一伙在这里对“考教授”大肆渲染,对教授们大加贬损。而实际上教授们对突然袭击及考教授这种方式是反对的,许多教授以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在试卷上写反对意见进行抵制。把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教授拉到一起考同样的试题,本来就是无稽之谈。而江青一伙却在分数上大作文章,通过召开座谈会、发简报、发文章等方法,竭力扩大“考教授”的政治影响,以此来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它考试的必要性。在北京“考教授”以后,上海、天津等地也先后仿效。一时间,将“考试”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在教育系统大加批判。

江青一伙抓住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借以在全国领域掀起“反复辟”浪潮。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情况是: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 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的批评,要她做出检查,学校负责人也在12日初中班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张玉勤当时离校后未回家,至14日在水库中发现她的尸体,她自杀了。事情发生后,县、公社和学校做了妥善处理。可是江青得知此事后,立即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河南重新进行所谓“调查”,把马振扶公社中学诬蔑为“复辟回潮”的

典型,说张玉勤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凶手”。江青借题发挥,在1974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又哭又闹,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叫嚷要向全国控诉。王洪文也帮腔嚎叫要给该校老师和负责人判重刑。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结果,当地政府对这件事重新做了处理,把该校负责人和班主任逮捕入狱,判刑2年。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共批斗了280余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的精神,组织学校师生检查,揭露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一批忠于教育事业的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复辟”典型,学校秩序混乱,学生旷课、打架斗殴、破坏公物,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师道尊严”、反对“右倾回潮”这些口号的鼓动下,1974年初,中学生几乎象“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学生一样,重新造起反来。北京市中小学校玻璃窗上的玻璃几乎被砸得精光,教室里的桌椅板凳被砸坏的很多,学校无法安宁,教师无法上课。而江青一伙却赞赏说这是“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在江青一伙看来,这是对周恩来整顿教育的最好回击,因而他们极力鼓动学生“反潮流”。

江青一伙也在文艺界开展了反“右倾回潮。”1974年1月23日至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举办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调演期间,江青一伙及其在文化组的亲信于会泳等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上桃峰》事件。山西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剧目《三上桃峰》,取材于《人民日报》1965年7

月 25 日的通讯《一匹马》，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戏中女主人公给因为买了病马而蒙受损失的桃峰大队送去一匹大红马支援春耕。王光美曾在抚宁县桃园大队搞过社教，于会泳等人便无中生有地说王光美 1966 年春也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诬蔑晋剧《三上桃峰》是吹捧“桃园经验”，为刘少奇翻案。初澜写出《评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鼓噪“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这篇文章发表在 2 月 28 日的《人民日报》上，由姚文元修改，经江青、张春桥定稿。江青一伙从《三上桃峰》开刀，对文艺界进行了次大洗劫。

江青一伙把歌颂教育工作者的《园丁之歌》说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园丁之歌》描写青年女教师俞英耐心教育引导小学生克服缺点、爱学习、守纪律，同时也教育青年教师方觉认识了自己对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树立起正确的教育思想。《园丁之歌》塑造了一个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青年教师形象。1973 年 7 月 28 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查湘剧影片《园丁之歌》，江青指责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员？”“‘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更大，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张春桥说：“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老师摆布。”

1974 年 6 月 14 日，江青说：“《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7 月 19 日，国务院文化组给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省、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8 月 4 日，初澜根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的文章。文章诬蔑这部影片是“掩盖和抹杀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宣扬地主阶级“文化至上”、“智育第一”，“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要让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11月，毛泽东在湖南观看这部影片时，热情鼓掌，说：“我看是部好戏。”江青等人竟把毛泽东的话当作谣言追查。1975年8月，湖南省文化局根据省委意见，向文化部写了《园丁之歌》不是坏戏，要求公演的请示报告，刘庆棠说：“这是明目张胆地翻案，是最后通牒”！

1973年10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圈阅同意对外文委关于邀请友好国家的两名音乐家来华演出的报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歪曲报告的原意，针对周恩来已经圈阅过的报告作了批示，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且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11月，他们首先在上海发难，开座谈会，散发简报，组织批判文章。12月7日，于会泳在北京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攻击周恩来圈阅同意的报告是“开门揖盗”，号召批判“无标题音乐”，“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15日，初澜发表了《要重视文化意识领域的阶级斗争》。12月25日至1974年1月3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天津召开各省市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传达江青等人的指示，部署批判无标题音乐，从1973年12月开始，全国陆续发表了100多篇批判文章。

1974年3月，周恩来病情加重，3月11日又住院检查，3月15日下午周恩来刚出院，江青就要他17日去参观所谓的“黑画”展览。1974年2月15日至4月5日，江青一伙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江青一伙指的“黑画”是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1971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

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能体现我们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江青一伙为了攻击周恩来,把“画”和“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策划了“黑画”展览。

1974年春节前夕,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在江青的授意下,到北京饭店查看布置画,边看边骂:“这是‘克己复礼’!”“是谁开的绿灯?必须坚决反击!”姚文元抓住一本经外贸部审查同意的《中国画》大作文章,说“这是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张春桥则抓住外贸部门出版的年历,挖苦道:“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工农兵越远越好!”王洪文则叫道:“什么中央精神?!不知道是什么人搞出来的中央精神!”姚文元说出口画是“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要外贸部门和美术部门查一查、进行批判。”在主子的旨意下,于会泳等人派人到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荣宝斋、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广为搜罗所谓的“黑画”,举办了所谓的“黑画”展览。他们在编写的展览“前言”里有意写了“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初澜在《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一文中再一次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竟然得到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绿灯”。他们组织数万人参观“黑画”展览,江青让周恩来3月17日参观画展,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上海、陕西等地也举办了类似的画展。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在3月6日抛出了批判《中国画》的批示:“这个中国画的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中的严重问题,“革命的同志们要充分警惕,决不能让外贸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复礼,决不让美术工作中的文艺黑线复辟。”上海《文汇报》、

《解放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的长文。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又批示：“版面可标通标《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界的复辟逆流》”。并在上海举办了所谓的“黑画”展。江青一伙借批“黑画”为名，横扫全国很多省市，据不完全统计，被定为黑画家或受到株连的美术工作者达上百名。《中国画》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画，是江苏南京艺术学院一位教授的作品，画面上是一只象征迎春的大公鸡，江青一伙却说：“寄托了今天社会上小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他们无限上纲，调子越升越高，对画家大加迫害，目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揪后台。”

1.5 “影射史学”射向谁？

江青一伙控制的批判组、写作组发表了大量“批孔”文章，这些文章假借“批孔”，大批“周公”、“宰相儒”，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以及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以评价法家进步作用为幌子，吹捧江青等人，为江青等人夺取最高权力制造舆论。他们大搞“影射史学”，对历史肆意歪曲、伪造和阉割。

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刊载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写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文章从孔子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拉扯到“周礼”，又从“周礼”扯到相传制礼的周公是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暗地指向周恩来。由姚文元授意，署名石仑写的《论尊儒反法》载于1973年9月15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创刊号上，在批判孔子时，文章说：“他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

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在赞扬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说：“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徕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家，”使“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在这里影射周恩来和一大批被解放的老干部。文章还说：“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1973年9月17日，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写的文章《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作用》发表在《北京日报》上；9月24日，陈新的文章《这是一场革命——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表在《文汇报》上；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9月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辩》；10月1日，《红旗》杂志转载了《学习与批判》杂志的文章《论尊儒反法》；《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了姚文元布置写作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这篇文章起草了8个月，姚文元总不满意，他要求突出批吕不韦的“要害”，说“吕不韦是折衷主义，要批折衷主义。”根据姚文元的指示，文章大批吕不韦的折衷主义。文章发表后，江青拍案叫绝，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姚文元也说：“这篇文章进了一步。”在姚文元的策划下，1973年《学习与批判》第4期发表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文章借批霍光影射周恩来，把老干部比作“贤良”、“文学”，说：“这批‘贤良’、‘文学’，是汉朝奴隶主残余势力思想代表”，“他们有霍光这个黑后台撑腰，有恃无恐。”文章骂丞相田千秋“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借骂田千

秋恶毒攻击周恩来。

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文章把孔子称为“宰相儒”,江青一伙借批“宰相儒”影射周恩来。他们授意梁效撰写《孔丘其人》和《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两篇文章,迟群和谢静宜强调,写《孔丘其人》要有针对性和现实感,写孔丘要“虚扬,不要太实;挂林彪,不仅仅是林彪。”要在“某人”上把文章作足,画好某一个人的像。1974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孔丘其人》,孔子被描绘为“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这是一篇不批林、假批孔、真反周的代表作。以史喻今,影射比附的文章纷纷出笼。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4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文章执笔人在粉碎江青反党集团后承认:“这是借批孔之名,对总理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5月20日,《学习与批判》杂志第5期发表康立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中舒》,明确宣称矛头指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孔丘其人》同时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评〈吕氏春秋〉》是姚文元布置写作的,姚文元要求重点批“折衷主义。”1974年2月4日,姚文元提出:“批判《吕氏春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用折衷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搞分裂的内容。”定稿前,姚文元亲自对文章作了修改,经张春桥审阅定稿。这篇文章说:“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他们常常摆出一付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

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情加重，但他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为党为国为民工作着。从1974年1月至6月住院动手术期间，他除去住院检查和病体实难支撑外，工作的日子共139天，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的有9天，工作14至18小时的有71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左右的有5天，连续工作30小时的有1次。随着周恩来的病情恶化，江青一伙更加快了反对周恩来的步子。他们把批“现代大儒”和对吕后、武则天等所谓“法家人物”的宣传，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舆论准备。

1974年6月12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并举行座谈。江青大谈“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当有人谈到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近代时，江青插话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这观点准备挨批判。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拍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继承。”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狂叫掀“现代大儒”。说：“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15日，《北京日报》刊登北京大学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江青以“特急”件送给《人民日报》转载。18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中说：“2000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

后。”公开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

6月17日至28日，江青带着梁效写作班子及一些亲信到天津，主持召开了1千余人参加的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江青大讲“儒法斗争史”，说什么“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主义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在一次谈话中，江青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不久，江青还指使谢静宜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她说的“现在的大儒。”

江青在天津期间还要服装设计人员翻阅唐、宋、明史籍，命令他们参照旧戏舞台上和历代封建贵族夫人、小姐服式，设计“开襟领裙衣”，定为中国妇女的“国服”，又强令文艺团体依同样方法设计演出服。6月22日，江青窜到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志们问好。”她在接见小靳庄妇委会主任周福兰时，要周福兰把名字改为“周克周”，江青对周福兰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哪。你叫周克周吧，克制周礼嘛。咱们用这个周，克他那个周。”在视察小靳庄期间，江青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标榜自己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并要把小靳庄作为她的“点”。

江青一伙在批判儒家的同时，大肆宣扬法家。1974年5月20日，《学习与批判》杂志第5期发表了罗恩鼎的《读韩非（王蠹）篇》；6月1日，《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了梁效的《论商鞅》。继江青6月12日和14日两次讲话后，6月15日，《北京日报》首先开辟了法家人物介绍专栏。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在刘邦这一条目中，塞进了按照江青调

子吹捧吕后的内容：“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3期上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专门为吕后列了一个条目，说吕后“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她积极推行刘邦制定的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6月27日，《天津日报》在《历史上法家人物和进步思想家简介》中专门介绍了武则天，说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推行了‘法治路线’。她把那些反动腐朽的代表人物罢黜或者镇压掉了，表现了她在政治上的魄力。”

7月5日至8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出版局联合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广东、湖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陕西等12个省、市主管理论工作的负责人和高等学校的有关人员，工农兵理论队伍的代表和特邀老专家等共52人，列席代表16人。这个会议是江青一伙一手策划的，姚文元有意要把它开成东汉章帝年间的白虎观会议，把江青比作章帝“称制临决”。姚文元在法注会议中间召见罗思鼎写作班子头目，说：“要把会议开好，意义不仅是注释法家著作。搞得好，可以象白虎观会议那样。”姚文元的私房话把江青一伙注释法家著作的阴谋打算，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东汉章帝于建初五年亲自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制成定论，写成了《白虎通议》。实际是独尊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从思想上巩固东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姚文元竭力要把法注会议开成白虎观那样的会，说穿了是要把用所谓法家思想掩盖的江青一伙的反革命谬论定于一尊，以便拥戴他们的当代“法家女皇”江青上台。

江青一伙在法注会议上接过“古为今用”的口号，大搞影射史学。江青一伙歪曲“古为今用”的口号，把历史研究工作纳

入了影射史学的轨道。在法注会议上，迟群说：“大家都在研究法家，目的是什么？研究法家，是为了指导今天的斗争。否则，谈不到古为今用。”所谓“指导今天的斗争，”就是适应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现实需要。以罗思鼎为笔名的写作班子的头目说：“研究儒法斗争史，无非是为了今天。”并提出：“‘两千年’与‘五十年’是什么关系？儒法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是什么关系？注法家著作与党的建设是什么关系？”在他的“启发”下，有人竟然说：“二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一直影响到五十年来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党内五十年来来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儒法斗争。”这样一来，就把江青一伙“古为今用”的老底全部抖落出来了。江青一伙以法家自命，宣扬法家功德无量，为的是给自己涂抹脂粉，树碑立传，为的是打倒周恩来和大批老干部，以便临朝登基，篡党窃国，实现其反革命幻梦。

江青一伙心怀鬼胎，生怕露出马脚。1974年7月19日，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了罗思鼎写作班子的头目，在坐的还有王洪文的秘书。四个人围桌而坐，促膝密谈。姚文元问道：“春桥给你们批些什么，你们都保存着吗？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我给你们批东西还是很注意的。”张春桥说：“国外敌人的报刊上，老是说《学习与批判》的文章是影射什么的，这个问题你们要注意一下。”他话头一转，又说：“将来要杀头，无非是杀我的头。我这个头本来早就该杀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一方面为自己提神壮胆，一方面为奴才撑腰打气。密谈中，姚文元唾沫横飞，昏话连篇，说：“法家是革命阶级，革命阶级当然是人民”，“吕后时期，政治清明。”他肯定吕后，是为了吹捧江青。

在法注会议结束时，江青出头露面了，这个反革命野心家，无法抑制她的歇斯底里，她说：“等待我们的还有更大量的

工作”，“这是百年大计问题，又有现实意义。”姚文元帮腔：“古为今用搞好了，注释法家著作就可以在方向、效果上，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挥作用。”她又说：“这次会议没有兵参加，是个很大的缺点。”张春桥应声：“各省回去开会，都要找军队。”江青还赞赏出土的吕后印，说：“这就是玉玺，是相当重要的东西。”她那急于当女皇的野心流露了出来。在会上，她还狂叫：“今天是‘八·七’，‘八·七会议’呀！我们就是斗儒！那时是主席斗陈独秀！”会议至此，便告结束。江青一伙煽起的批大儒，反总理；尊法家，赞女皇的反革命狂潮在全国泛滥开来。根据姚文元的意见，法注会议拟定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8月22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出版局将《规划草案》发送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各军兵种。

梁效、罗思鼎摇动笔杆，连篇累牍地抛出了一大串尊法反儒的文章，有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有罗思鼎的《论吕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李斯》、《论西汉初期政治与黄老之学》、《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略论思想发展的源和流》等等。这些文章伪造历史，吹捧吕后、武则天，美化江青；这些文章篡改历史，借批判儒家，恶毒攻击周恩来及大批老干部。例如，1974年8月20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刊登了梁效写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在文章中，武则天被描绘成一个敢干敢入的反潮流的革新政治家，文章鼓吹“她终究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罗思鼎炮制的《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发表在1974年《红旗》杂志第8期上，文章借用刘邦，美化吕后。罗思鼎写作组还

炮制了《论吕后》一文，按照江青的口径向写作组成员传达了三点要求：要写“吕后是了解刘邦最深的，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生活时间最长，刘邦所建立的功绩是与吕后分不开的”；要写“吕后是刘邦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者”；要写“吕后是按照刘邦生前的法家路线办事的，除吕后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之业”。文章很露骨，因故未发表。

这一时期，评法图书、文章泛滥成灾。据出版部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0403种；其中评法的有907种。省级以上报刊所发表的评法之类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传播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的内部资料，更不计其数。江青授意梁效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概况》和姚文元授意罗思鼎编写的《儒法斗争史话》大肆宣扬了江青一伙的尊法反儒谬论。这些图书和文章造成了思想、理论的混乱。

江青一伙的尊法反儒活动也给教育界造成了混乱。1974年，由迟群把持的国务院科教组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第6期发表通讯《高等学校在理论战线上的战斗任务》。评论提出，高等学校要抓紧注释法家著作，改革教材，从理论上总结教育革命经验，组织理论工作的骨干班子，培养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参加战斗等。根据江青提出的研究“儒法斗争史”的主张，高等学校的“批林批孔”运动也转入搞“评法批儒”和“儒法斗争史”，注释法家著作，用“儒法斗争史”改造文史哲各科教材体系等。在理工农医科开展了研究儒法斗争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等。《教育革命通讯》从第6期起，开辟了“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专栏，发表评介教育史上儒法斗争的文章。

7月12日，江青对《北京日报》内部刊物上登载的北京市第27中学孙武成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一封信批示道：“中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要抓典型，以点带面。如不及时抓紧，对青少年、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针对少年、儿童编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能使一个人从儿童、少年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孔老二，值得深思。”国务院科教组于20日将江青的批示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江青的指示在《教育革命通讯》第8期上发表评论《夺取中小学批林批孔的新胜利》。8月13日至21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北京、天津、辽宁、河北4省、市中小学批林批孔汇报会，会议听取了一些地方和学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的汇报，组织代表参观学习天津站和小靳庄大队以及京津两地5所中小学的“批林批孔”经验。会议强调发挥中小学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作用，研究了如何使中小学“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的问题。会后，科教组转发了“批林批孔”的经验材料，以推进中小学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大中小学教材中塞进了大量的尊法反儒、儒法斗争的黑货。迟群说：“江青指示，要注意对青少年的教育。法家著作注释本印出来，中小学每个学校要发一本，这是百年大计。”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著述，也被贴上了儒法斗争的标签。

.....

198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郑重指出：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

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一段公案终于昭示天下。

二、“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不满江青始末

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干扰破坏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引发了相当的议论，很多人不满江青的行径。对江青的所作所为，毛泽东也多次对其进行批评……

2.1 “宁长社会主义的草……”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的开展，破坏了在“九·一三”事件后，经过全党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形势，使全国重新出现了动乱的局面；使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冲击。

1974年6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

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帐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略影响较大。煤炭比上年同期下降 6.2%,铁路运输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2.5%,钢比上年同期下降 9.4%,化肥比上年同期下降 3.7%。1至5月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下降的有山东、湖南、贵州、内蒙古、江西、浙江、安徽、山西、湖北、新疆、四川等 11个省、自治区。1974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到 0.3%,粮食比上年增长 3.9%,棉花比上年下降 3.9%。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然而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继续鼓吹“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谬论,鼓动学生“反潮流”,鼓动工人停工造反。如,广东省马安煤矿有人大放厥词:“不为走资派生产,停工停产也是革命”,使煤矿停工半个月之久,当年只完成煤炭产量的二分之一左右。

人们对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深表忧虑,不少人进行了抵制。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写了一篇《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文,对孔子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他说:“目前批林批孔运动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1974年11月,在广州市出现了一张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大字报,大字报对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掀起的“反复旧回潮”、“反潮流”进行了讽刺,提出在中国要解决民主与法制问题。

2.2 “不见还好些”,“多见何益?”

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干扰破坏国民经济,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有相当的议论,很多人不满江青一伙

的行径。对江青的所作所为，毛泽东也多次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共产党员”的信，这封信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批评江青坚持“一切为样板戏让路”，这封信还指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口号和提法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在1973年11月25日，对这封信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允许批评。

毛泽东 1973. 11. 25

此后，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批评江青“迫不急待”。

1974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让邓小平参加。江青清楚，邓小平的复出将威胁着她，她反对。毛泽东得知江青的态度后，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3月20日，毛泽东针对江青的一个时期以来的言行，又写了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 3. 20

江青自恃有特殊的身份，常常肆无忌惮。对有些事，毛泽东也是看不惯的，对江青也多次进行了批评。但是江青知道，毛泽东不会与她决裂的，因为毛泽东认为江青批刘、林有功，毛泽东肯定“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轻易否定江青。

2.3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

1974年的夏天，骄阳似火。7月17日下午，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毛泽东意识到江青积怨甚多，发觉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宗派活动，对他们提出了严厉地批评。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毛泽东说：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说，江青话里包含着不满。

“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说。

“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江青马上把话一转，“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是谁搞的。”江青的用意是指向周恩来的，她知道拍这部电影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

毛泽东宣布：

“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2.4 “她算上海帮呢！”

最后，毛泽东提醒大家，同时告诫江青一伙：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的问题。

之后，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对江青一伙也进行了批评和斗争。江青一伙不得不有所收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至此，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名存实亡。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已经乱了八年，人大会议已中止了七年。要开人大，就要重新“组阁”。治国安邦，靠江青一伙不行，还得靠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四届人大是很关键的一局。毛泽东的思路朝有利于周、邓的方向发展。但江青一伙是决不会善肯罢休的，他们要跳出来同正义的力量较量。山雨欲来风满楼，又一场斗争要开始了。

三、一场流产的“政变”

——“组阁”风波风云录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把周恩来、邓小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地企图取而代之。江青一伙知道，如果人大之后国务院形成一个周邓体制，情况将大为不妙。于是，江青一伙，在四届人大召开之际，认为时机已到，撕破伪装，赤膊上阵，陷害周恩来，并对邓小平出来工作百般阻挠。在围绕国务院人选进行的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挫败了江青一伙妄图“组阁”的阴谋……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3.1 大造舆论为哪般？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又是写信，送材料，又是到处讲话，制造事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企图打倒国务院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和其他同志，利用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由他们出面组阁。本来四届人大按规定早就应该召开了，中共九大后已提出召开四届人大的任务，但因为林彪一伙的抢班夺权而推迟。中共十大开过后，召开四届人大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江青一伙在十大上窃取了更多的权力，随着权势的膨胀，野心也急剧膨胀。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指示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班子，以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名，鼓吹“在中央政权始终保持一个法家领导集团”，同时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上台做现代“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

先制造舆论，是江青一伙的惯用手段。周恩来住院期间，江青一伙更加紧了夺权活动。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离开他住了25年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的病房，他的癌症越来越严重了。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的一间卧室，一个客厅。

室内的陈设极简单，办公室里有一张两面抽屉的办公桌，桌前有一把靠背椅。办公桌的一侧，还有一个长条桌，铺一块绿呢子布，上面摆着烟缸和茶杯。副总理及部长们来周总理这里开小会或谈话，都是围着长条桌坐着。

靠墙壁，正中间有一个简易木架子，本架上摆放着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像。两边各摆一个书柜，办公室两头还有书架、书

柜，书架上的书满满的，主要是马恩列斯毛著作，干部必读书，辞源、辞海等工具书。

除了开会、视察、接见外，周恩来在家时，总要带上工作套袖，坐在办公桌前伏案办公。他有夜间办公的习惯，常常是通宵达旦。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也有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每次离开办公室时，他抱一堆文件，放在床头的椅子上，上床后继续办公几个小时，批阅的文件由卫士交机要秘书，他才会睡觉。

自1949年周恩来走进西花厅，这所古老的房子陪伴他度过了25年。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情便有波动。他面对江青一伙的恶毒攻击，肆意诽谤，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癌症，他更加奋不顾身地工作着，以减少由于江青一伙干扰对国家造成的损失。4月28日，5月19日，5月23日，5月25日，周恩来四次发生缺氧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6月1日入院作手术。这天中午，他步出中南海西花厅，刚到门口，转过身，柔和的目光久久望着这古老的房子，主人的依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手术之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但他从未停止过工作。在病房里，他让工作人员为他念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参考资料。有时，邓颖超来了，就由邓颖超念。刚能下地，周恩来又带病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

趁周恩来住院之时，江青一伙加紧阴谋活动。他们先从制造舆论开始，指使他们的写作班子，连篇累牍地炮制大量反党文章，别有用心地吹吕后、武则天，批周公，批宰相，大搞影射史学。并摆出一副总结儒法斗争历史经验的面孔，宣传西汉王朝前期和中期反复辟斗争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在中央政权始终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为江青一伙登台执政鸣锣

开道。

《红旗》杂志在1974年第10期发表了姚文元策划和修改定稿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从6月5日姚文元布置写这篇文章，到10月1日刊出，历时4个月。《红旗》编辑部贯彻姚文元的意图，说文章的主题应放在“研究儒法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意义”上，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所以要“针对当前的主要问题来写”，要着重写“复辟反复辟”的经验教训。姚文元说：“索性改为儒法斗争对今天的意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说：“新兴地主阶级能不能保持政权，关键在于能不能保证继续执行法家路线。”文章还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历经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支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清君侧”的策略就是要通过“搞垮中央的法家领导集团”改变法家路线。文章借古喻今，点明本意，“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往往采取这种‘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打击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他们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同时标榜自己是法家人物，应主持中央工作。在此以后，江青一伙的御用写作班子发表了许多文章，为所谓的“中央法家领导集团”鼓吹。

11月24日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刊登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也分别发表了《从曹参“遵而勿失”看吕后时期的法家路线》和《汉元帝刘奭的尊儒反法及其历史教训》等文，突出宣扬了中央政权中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的重要性。文章鼓吹，要保证法家路线的延续，必须“吸收新的法家人物，充实法家领

导集团,使法家路线后继有人”,必须“不断提拔坚持法家路线的新人,特别是青年法家人物。”

江青一伙利用在全国各地的走卒,想通过四届人大,将他们物色的人选安插进政府要害部门。

早在1972年上半年,张春桥便以上海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要为党多输送干部为由,说什么“我们也要培养工人大使,现在的外交人员,到联合国去的都是知识分子。”在上海事管组织工作的金祖敏闻风而动,选调了80名工人,送到复旦大学培训,准备两年后分到外事外贸部门,一旦江青一伙上台,便将他们送往国外担任大使。1972年8月,王洪文提出,“要准备一百名干部,随时准备抽调出去。”1973年1月,他又指示上海市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并亲自到会作指示。

王洪文、张春桥得知四届人大即将筹备召开,就在1973年9月,指示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张春桥反复叮嘱“不要放过当前的时机”。10月,王秀珍等人就在上海举办了“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1974年3月,王秀珍到北京找张、姚、王密谈,王洪文对王秀珍说:“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还具体提到:“冯品德可以担任全国海员工会头头”。张春桥强调:“上海市委开个会,抓紧部署。”王秀珍则大声叫喊:“当前最急的问题是干部问题,选择新干部不能再拖了。”4月底,上海市委提出一个88名中央副部长备选名单,报送给在中央学习班的金祖敏。到了10月,王洪文又进一步指示:“要准备把在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除了上海以外,在辽宁和其他地方,江青一伙也作了组织准备。

3.2 “风庆轮”事件的烟幕

1974年6月,周恩来住进医院,仍带病坚持工作。但是,管理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这样繁重的工作,不是一个重病在身的老人所能承担的。作为老资格的副总理,邓小平在国务院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了。为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更好地维持国务院的工作,增设第一副总理就很有必要了。显然,正在筹备召开的四届人大要解决这个问题。江青一伙以为这是他们登台组阁的好时机。可是没有料到,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王洪文亲笔记录的、张玉凤传达毛泽东指示的电话记录里,明确记有“谁当第一副总理?(邓)”。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无疑打乱了江青一伙妄图抢班夺权的计划,眼看要到手的组阁大权将化为泡影,这是他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江青一伙按捺不住了,经过密谋策划后,采取了一系列卑劣行动。

1974年10月1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评论员文章说:“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等人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文章还别有用心地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风庆轮”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1974年“五一”节刚过,风庆轮从上海港启航,驶往欧洲,往返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航程三万二千哩,历时一百五十天,在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这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全部采

用国产机器和设备的万吨轮。它的远航成功,是造船工厂、远洋海员辛勤劳动的结果,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人们为风庆轮的返航成功欢欣鼓舞,但是江青一伙却借这件事策划一个阴谋。

早在1974年初,风庆轮尚在重载试航阶段,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就制造事端,污蔑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是“崇洋公司”,点名批判交通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采取指桑骂槐的卑劣手法,以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矛头指向中央。他们宣称“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想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打成“当代的李鸿章”。

在风庆轮远航成功之后,江青一伙就象毒蛇看准了猎获目标一样,立即张开血口,恨不得把胜利成果一口吞下。江青说,报上登风庆轮航行的消息不引人注目,要在返航时大写特写,登在头版头条。张春桥下令轮船返回上海时,要组织盛大欢迎。人们不禁要问:江青一伙为什么对一艘国产货轮的远航归来这样感兴趣呢?实际上,在风庆轮远航前两年,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就已经多次横渡太平洋远航加拿大了,还有其他的国产轮船也远航西非。为什么江青一伙单单对风庆轮“关切备至”呢?这里面有鬼。这个鬼就在于,风庆轮远航归来的时间,正是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江青一伙准备“组阁”活动最紧张的时候,他们要利用“风庆轮”向周恩来施放毒箭。

周恩来对我国发展造船工业、建设远洋船队十分关心。1963年,周恩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亲自提出过一个发展造船工业和买船的规划,并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周恩来指示,加速发展我国远洋船队,要立足于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但也不排斥在有利条件下适当购买一些船只,以尽快结束依赖租船的局面。1973年,周恩来又作了部

署,集中力量在短期内建成一批深水泊位,加速我国沿海港口建设。

而江青一伙竭力抵制周恩来关于积极发展造船工业和远洋运输业的指示。王洪文同适当买一些船只的意见大唱反调,说什么“那些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必然赞成和拥护立足于向外国买船”。当他们得知风庆轮的一位副政委曾对“四人帮”有过不满言论时,他们大作文章。风庆轮上的某些人要求副政委批判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副政委加以拒绝,说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地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当江青一伙获得副政委对他们不满的汇报材料时,王洪文要求追查后台。江青责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叫嚷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张春桥、姚文元在材料上批示,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要国务院把这个问题拿到经济部门去进行教育。

一时间,被江青一伙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了大量文章,以风庆轮为背景的电影、戏剧、小说、电视、广播也纷纷出笼,鼓噪上阵,造谣说:“有人说国产轮只能跑近海,不能跑远洋,”“有人主张风庆轮必须换上五大件进口货才能远航。”什么“风庆轮是批出来的,斗出来的”,“远航权是争得来的”;什么“瞧不起国产的东西,在洋人面前矮了一头”;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大帽子,也一顶一顶地飞了出来。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周恩来等一批中央领导同志打倒,夺权上台,取而代之。

借风庆轮之事，江青一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频频向邓小平发难。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突然袭击，挑起争端，她拿出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是什么意思。

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阴阳怪气地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批驳江青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江青一伙一拥而上，叫嚷：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

邓小平非常愤慨，含着蔑视的目光，离开了会场。

3.3 长沙诬告风雷激

政治局散会后，江青立即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她住的钓鱼台17号楼碰头密谋，分析议论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江青吵架的原因。

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果然发生了。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

究竟采取什么对策，一直研究到午夜后，王洪文提出他到长沙去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得到江青的鼓励。

第二天，10月18日清晨，一架神秘的专机从北京的机场起飞，飞往长沙。王洪文以江青特使的身份专程去长沙，背着周恩来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偷偷地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

王洪文在飞机上坐立不安，他深知，如果能把毛泽东说服了，站在他们一边，那周恩来和邓小平就输定了。但是他又感到此行凶多吉少，能不能说服毛泽东，毫无信心，如果失败了，自己这个出头的椽子得先烂。

上午10点到长沙。下午2点，王洪文乘上高级轿车径直去毛泽东下榻的宾馆。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据当时在场的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写的证词证明：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主席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

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主席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的证词回忆道：

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他们搞在一起。你回去后和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6年后，特别法庭审判江青等人时，王洪文供认：

目的就是在毛主席面前搞臭邓小平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这次去长沙告状……主要是恶人先告状，抢在邓小平同志陪外宾去前，目的是要毛主席了解吵架的所谓“真相”，也就是了解邓小平同志的所谓问题……实际上是诬蔑陷害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阴谋活动……

就在王洪文南飞长沙这天中午，江青把将去长沙参加会见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10号楼。

王、唐二人，一个是毛泽东的侄女，一个是外交部官员唐明照的女儿，她们的职务是外交部的翻译。她们不仅为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担任翻译，而且是毛泽东家的常客。毛泽东非常信任王、唐二人，要这两位年轻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从她俩这里了解一些情况的反映。因此，王、唐二人有着特殊的地位。

毛泽东已经与江青分居多年，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两人见面不多。凡有事，江青要么事先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提出

申请,得到毛泽东的许可,方能见面;要么,通过能直接接触毛泽东的人传递情况。江青把王、唐两人请来,就是想让她们利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在毛泽东面前再奏周恩来、邓小平一本。

江青说:毛主席很快要在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报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开会时,就风庆轮问题,邓小平和我发生了争吵。然后邓小平拂袖而去,致使会议无法开下去。这些日子,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的当天下午回到北京。在长沙时,他当面向毛泽东说,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可是回到北京,他不去找周恩来、叶剑英,而是先到钓鱼台,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禀报他的长沙之行。

18日夜里,他们四个人再次聚集到钓鱼台17号楼。还特地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担任翻译、记录的王海容、唐闻生叫去。

当王海容、唐闻生到17号楼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在场。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开支和外贸中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还把17日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江青要王、唐再去长沙诬告邓小平。在谈话中,透露出王洪文已见过毛主席。毛主席叫他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会打仗。

第二天,即10月19日,王、唐感到昨天夜里的会议情况,事关重大,觉得应该先向周总理汇报。她们来到医院,向总理报告了江青找她们谈话的情况。

周恩来听着汇报，紧皱着眉头，一种忧虑、不安袭上心头。他清楚，王洪文的长沙之行纯属一种“倒阁”行为，江青想成为武则天之二，要抢班夺权了。眼下，自己病情日重，要千方百计保住邓小平，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兴衰、共和国走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决不能让步。

周恩来听完汇报，意味深长地向王海容、唐闻生说：他已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经过他的了解，事情并不象江青等人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邓小平，邓小平已忍了他们很久。

周恩来还对王、唐二人说：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王、唐二人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去长沙，10月20日，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汇报了跟总理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还建议邓小平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十分赞扬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并指示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还指示王、唐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1974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长沙面见毛泽东。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以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毛泽东指的是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双方的对阵。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邓小平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表示,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再提什么意见了,但责任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

这样,毛泽东的态度,使江青一伙的攻势遭到了严重挫折。

3.4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王洪文去长沙告状虽然扫兴而归,但江青决不会就此罢休。下一步棋走的好坏,将关系到未来决战的命运。

江青与张春桥在钓鱼台17号楼进行了一次密谋。张春桥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的方案。上策是主动出击,再一次告“御状”,再倒一次“阁”,让邓小平组阁不成;此计不成,就掺沙子,安插亲信进要害部门,联合组阁,牵制住邓小平,这是中策;最耽心的是下策,国务院的大权完全被周恩来和邓小平控制,自己落个彻底失败的结果。

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向周恩来、邓小平进攻,向毛泽东要官、要权,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于1974年11月12日在江青的一封信上,亲笔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回了封信:“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

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11月20日，毛泽东回复：“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希望毛泽东给她安排工作，意思是要官、要权，毛泽东否定了她的这个要求。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并汇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信尾表示，“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12月间，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届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他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几次讨论研究，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让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随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三个方案。

12月下旬,北方进入数九寒天,寒风刺骨。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并反复叮咛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归来。保证周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与周恩来同机去长沙的还有王洪文。毛泽东让他和周恩来负责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于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与周恩来、王洪文共进行了四次谈话。23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逗留3天谈谈。24日又说,让他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让他们再留两天。27日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五天。

这四次谈话,毛泽东主要谈了以下问题: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邓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高度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政治思想比他(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还提名陈锡联为副总理,说张春桥有才干。

对江青的批评。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江青说没有工作做,毛泽东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说自己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

错误是 11 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当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条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 3 个主题，就搞乱了。毛泽东说，搞乱了，也不告诉他。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他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毛泽东说，批林容易批孔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谈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毛泽东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周恩来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毛泽东点头。

周恩来把这几次谈话的内容归纳整理了一个提纲。1974 年 12 月末到 1975 年 1 月初，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要点。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对于挫败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长沙之行，王洪文又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为了应付毛泽东，王洪文写了一份检讨书：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恳地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到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为“风庆轮”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地解决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的意见，错误地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邓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特意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地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地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王洪文

这篇检讨书是1976年10月6日逮捕王洪文时，从他的住处搜出的。

几乎在同一时期，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向毛泽东传送她的提议，“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对王、唐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事态的发展没有朝江青一伙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在周恩

来去长沙时，他们就意识到事情不妙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批准李德生辞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请求。

这次会议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支持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并任国务院总理的意见，粉碎了江青一伙妄图组阁的图谋。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并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江青不甘心组阁的失败，在十届二中全会结束的当天深夜，江青窜到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借谈历史吹捧吕后，还吟咏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用指责汉文帝没有重用贾谊，来比喻自己未能受褒，以发泄对人事安排的不满。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这十年真是风雷激荡，变化沧桑，正义与邪恶一直在进行着激烈斗争。四届人大的召开表明党内正确势力力图使国家走上正轨的努力有了初步结果。

当形体消瘦、目光炯炯的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作《政府工作

报告》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周恩来在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指出：为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这个报告把所谓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作为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这就把“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新宪法又把“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力规定下来，这就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篡权提供了合法的手段。

17日，全体代表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22 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12 人为副总理。

虽然张春桥及其帮派人物钻进了国家领导人行列，窃据了部分重要职位，但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使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没有得逞。

会后，因周恩来病重住院，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四届人大一结束，江青一伙便感到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尽管他们的一些亲信象王秀珍、朱克家、陈阿大、李庆霖、张铁生、浩亮等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但王洪文没有当上副委员长。在国务院中，也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江青一伙的亲信在各部委中没有多少人获得重要职务。迟群对此破口大骂：“部长席位差不多给他们捞光了。”江青更是气急败坏，当着王海容、唐闻生的面，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大骂一遍。

江青被捕后，王、唐两人写了揭发材料：

1975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叫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几乎对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了事。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唐闻生、王海容

1976年10月17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为四届人大的组阁而进行的较量，以江青一伙阴谋夺取却败了下风而告结束。四届人大之后，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重新工作后，致力于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四、东山再起挽狂澜

——邓小平复出、整顿始末

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戏剧性巨大变化的一年。邓小平由“文化大革命”初期“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跃成为担负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他重新工作后，励精图治，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成效显著。但是江青一伙对全面整顿恨之入骨，他们利用毛泽东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掀起了左倾的理论学习运动，“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干扰破坏全面整顿。这样，在全面整顿的同时，又交织着左倾理论学习运动……

4.1 邓小平第二次出山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引起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思索。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元

帅的追悼会。在接见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时，毛泽东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表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又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以便利用毛泽东的话，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偏差。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仅次于刘少奇的“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1969年3月2日，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的中方领土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下令人民解放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他的紧急计划还要求党的首脑人物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奄奄一息的刘少奇躺在担架上被送到了开封，朱德去了广东，叶剑英去了长沙。邓小平和卓琳则被送到了南昌。林彪的用心是险恶的。一到南昌，邓小平就明白了，这里是林彪的势力范围，他是想让自己自生自灭，永远囚在这里，永不翻身。

邓小平住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的一座两层红砖小楼里，有警卫人员看守，不准私自与外界联系。不久，邓小平和妻子卓琳被安排到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半天劳动。

从住地到工厂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他步行往返。开始，让他干些轻活，后来他主动提出来干钳工，承担了锉螺丝的力气活。干这个活，邓小平是很熟练的，他青年时期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学过钳工，没料到70岁左右时又派上了用场。

每一天，邓小平的工作、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则到自家小院内的菜田里耕作，黄昏时绕着院子散步沉思，晚上常常读书至深夜。1971年，经邓小平夫妇申请，

他们的高位截瘫的儿子邓朴方来到父母身边，邓小平又担起照料儿子的任务。

林彪集团的垮台给中国政局带来某些微妙的变化，被林彪打下去的某些老干部又被重新启用了。有利条件慢慢向周恩来和“三老四帅”方面靠近。林彪、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之间“三足鼎立”之势因林彪集团的毁灭，剩下两军对峙。江青集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专事捣乱破坏，不通建设。要解决泱泱大国的吃饭穿衣问题，还得依赖周恩来等人。毛泽东作出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同意撤销军事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不会忘记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在等待时机使邓小平重返政坛。

王震也是被林彪的“一号令”赶到江西东乡红星垦殖场的。林彪摔死后，他回到北京。他从江西回到北京后，详细地向中央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建议毛泽东尽快启用邓小平。

邓小平在得知林彪摔死后，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他不断分析形势，1971年11月，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愿为党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1972年8月，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交毛泽东。

邓小平在信中说：

我同林彪不很熟悉，但尽管如此都随时准备参加批判他的运动。以前我也执行过修正主义路线，犯过错误。现在我想真诚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决不翻案。现在，我身体健康，希望党给我一个普通职位，以便我有生之年能为党和人民服务。

毛泽东对邓小平是了解的，196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力主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

泽东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又使毛泽东有可能对邓小平作出新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署名“邓小平”的信后，沉思良久，拿起笔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非常的年代，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段不足 200 字的批示对邓小平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这就为邓小平出山提供了前提。

周恩来第一个见到毛泽东的批示，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启用邓小平的一个信号。他当机立断，一方面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中央办公厅印刷厂印若干份，分别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另一方面他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即解除劳动，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活动。又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身边，协助他的工作，改善他的生活。

1973 年 2 月 20 日，在江西度过了三年多时光的邓小平，结束了钳工生活，携全家返回北京，住进了景山后街一座小院里。

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启用邓小平的问题。以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为一方;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一方,进行了较量,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先念旗帜鲜明地拥护毛主席的指示,立即启用邓小平,不能再拖了。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周恩来在启用邓小平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位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搏击的勇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超人的智慧和娴熟的策略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着复杂的斗争。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对周总理作了评价: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这一天,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邓小平出席了这个宴会。当时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在14年后他的《邓小平》一书中描绘了戏剧性的场面:

他(指邓小平)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

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在恢复组织生活 5 个月后，邓小平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973 年 8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 10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197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1974 年 4 月，邓小平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出席这届特别会议，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

声誉，也提高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谈了人事安排，提议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就为邓小平出山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1975年1月5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7日，他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排在第一位的国务院副总理，负责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这样的升降，在国际政治上和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有的外国记者称邓小平为“不死鸟”，认为主要是他个人有什么奇异的本领。实际上，这是“时势造英雄”，是全国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

当初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是毛泽东；把邓小平作为“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也是毛泽东同意的。而启用邓小平，委以重任的，也是毛泽东。这是因为：

当时的客观形势迫切需要选择一个人来代替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周恩来病重入院，需要有个人出来代替他处理日常工作。“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是王洪文，毛泽东认为王洪文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兼工农兵于一身，又具有造反精神，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王洪文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被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考验，毛泽东发现王洪文与江青等人结成上海帮，参与江青阴谋组阁的活动，而且王洪文资历、能力也有限。毛泽东感到王洪文难以担负起党和国家的重任。毛泽东也考虑过让张

春桥接班,但又认为他长期从事文字宣传工作,别的方面经验欠缺,而且群众威信也不高。毛泽东有意让他担任一些别的工作,如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在军队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难以担负重任。至于江青,毛泽东是对她不满的,坚决不同意她组阁。至于华国锋,当时华国锋已由湖南调至中央,从1971年秋开始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但他在中央的地位较低,影响较小,不在毛泽东的考虑之列。

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能力很强。毛泽东对邓小平有较全面的了解,虽然毛泽东对邓小平也有不满的地方,但总的评介是较高的。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就对邓小平做出了肯定的评介。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又讲邓小平的一生“大概是三七开”。1974年底,又讲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说明,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决不是偶然的。当时我国的政治局势十分严峻,社会秩序混乱,生产下降。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利用“批林批孔”反对周恩来,暴露了丑恶面貌,不得人心。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但也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他对江青一伙的多次批评是有利于遏制江青一伙的猖狂的。毛泽东在四届人大期间提出了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复出是必然的了。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领导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重任交付给邓小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说明毛泽东具有战略家的眼光,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出山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

4.2 东山再起挽狂澜

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给了历经内乱之苦的全国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虽然这次大会仍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但会后，周恩来病重，即由邓小平实际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邓小平素有“钢铁公司”之称，他办事机智果断，雷厉风行。上任伊始，就坚定地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正确意见，坚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鲜明地提出整顿的口号，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各条战线的混乱。

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9年了。在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下，经济一塌糊涂，无政府主义泛滥，人心涣散。邓小平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一次，他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随时有被打倒的危险，但他不畏难险，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他一上台，便身手不凡，坚定地、有步骤地抓全面整顿工作。

国务院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从2月到10月先后召开了解决全国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南方十二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等一系列会议。在这些会议中，邓小平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其指导思想是：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大局。全国各方面存在整顿问

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要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在整顿中要落实政策,要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抓规章制度,既要抓政治,又要抓利润。要重视教育,提高教师地位。要搞好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

邓小平先从军队的整顿抓起。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的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他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针对军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这是邓小平抓全面整顿的开端。

根据邓小平在1975年1月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精神,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问题。叶剑英、邓小平等到会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详细讲了军队整顿的任务。他首先分析了军队的状况,肯定“总的状况是好的”,但又指出部分单位和同志主要存在“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并分析了具体现象和滋生这些毛病的原因。接着讲了整顿这五个方面问题的措施,主要是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训练、指挥水平和管理水平。同时指出要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加强政治机关,选拔干部,军队内部的团结,军队和

地方的团结以及军民团结等问题。还讲了整编中的干部处理、安置、调整和交流问题。

这次会议结合批判和清算林彪集团反军乱军的罪行，确定了一些重要单位的编制和领导班子的整顿调整。这对江青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经济工作的整顿是从铁路运输开始的。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批林批孔”以来，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4条大动脉的畅通，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1月份为45800车，到2月份降为43000车，按需要相差12000车，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生活。

为了扭转铁路运输每况愈下的局面，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他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就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以

认真讨论,中共中央于3月5日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经毛泽东同意,作为中央9号文件发出。决定全国铁路恢复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对于破坏干扰铁路运输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干部,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者,应及时调动工作。对蓄意制造交通事故、煽动停工停产、煽动哄抢国家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坏分子,坚决依法惩处。

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在地方的配合下,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召开几千人、几万人、十几万人大会,反复宣传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果断的组织措施,重新配备领导班子。法办33个煽动闹派性、武斗、停工停产的坏分子。

经过一、两个月的整顿,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到4月份,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为提高。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以前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而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随着铁路运输的好转,整个工业生产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局面,1至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邓小平的讲话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首先是带动了钢铁工业的整顿。

接着邓小平又抓了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年5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

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1975年的前4个月,全国欠产钢195万吨,鞍钢、武钢、包钢、太钢欠产严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召开了这个座谈会。万里在会上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21日,邓小平就钢铁工业整顿发表了重要意见。29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根据铁路整顿的经验和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4条办法。一是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二是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土必争,寸步不让。三是落实好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四是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

在29日的讲话中,邓小平首先提出与左倾错误和江青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会议确定,1975年计划生产2600万吨钢的指标不能动,欠产要补上,几个大钢厂要限期扭转局势。6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并转发了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经过一个月的整顿,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帐。太钢、武钢、鞍钢的生产形势开始好转。

在铁道运输和钢铁生产好转的带动下,其他行业也跟上

来,1975年7月,国务院在《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为了使整顿国民经济的工作更有起色,8月3日,邓小平在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组织建设,都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敢’字当头,就能把队伍带起来。”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积极性,要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不要把知识分子叫作老九嘛!”并传达了毛泽东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的,“老九不能走,还是要”。

8月18日,邓小平参加国务院关于整顿工业问题的讨论,他强调“企业要整顿”,“企业管理要整顿。”并从五个方面讲了发展工业的有关问题:一是要强调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工业的重大任务是促进农业现代化。二是要采用新技术。有一个出口政策的问题,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三是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业。工业越发展,企业科研人员的人数应当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四是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包括品种、规格、质量在内。五是规章制度的关键是一个责任制,现在的问题是无人负责。要突出这个问题。现在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开始要严一些。

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讲话精神,国家计委起草并修改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是国家计委从7月中旬开始起草的,起先是14条,后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修改为20条,故简称“工业20条”。9月上旬,北京、上海等地的20个企业的负责人在北京座谈“工业20条”,10月又把“工业20

条”拿到在京讨论农业问题的 12 个省、市委书记当中征求意见,得到普遍赞同。“工业 20 条”的主要内容是:(1)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团结,促进生产发展。不能把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2)整顿企业,首先要整顿党的领导。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所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好,改变“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调整“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建立起一个精干的而不是臃肿的、坚强有力的而不是松散软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3)整顿企业管理,严格遵守制度。所有企业,要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要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4)要落实党的政策。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凡是被戴上“保守派”、“站错队”等帽子的,一律摘掉。要信任科学技术人员,积极发挥他们的才能,不适当改行的,要加以调整。(5)对于“造反”、“反潮流”要进行具体分析。正确的要支持,错误的要批评,反动的要顶住。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6)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发展生产。(7)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8)干部、工人、科技人员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邓小平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发展了过去《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对当时的工业整顿发生了积极影响。在起草这个文件的同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又先后起草了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条例。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工业二十条》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邓小平及时地提出了整顿党风问题。“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混乱都是从否定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开始的,抓整党就

抓到了根本问题。7月4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的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他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和“党讲话不大灵”的严重问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应要求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讲到党的作风，强调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指出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并按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同时也指出要有必要的斗争。

9月27日和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他指出各方面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他又特别强调了“要敢字当头”是这个整顿的前提。同时还讲了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尖锐批判了林彪主张只学“老三篇”那套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做法，提出“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实际上已经把整顿工作引伸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正确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在北京闭幕。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着重强调搞好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拖了我们的后腿。他还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强调对各方面工作都进行整顿的方针，实际上

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这次会上，华国锋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会后，全国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大抓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全国一部分农田得到了改造，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但由于千篇一律地要求尽快建成大寨县，照大寨的一套办法去做，没有因地制宜，使一些地区出现了脱离实际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在生产关系上急于搞过渡等问题。

这一时期，中央采取了措施，落实政策，解放干部。1975年4月底，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矛盾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的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治部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落实政策的一次重大行动。邓小平将贺诚之女写给他要求给他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作了安排。5月17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贺诚任职报告上作了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7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治病。”这些批

示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导,为了摆脱科学技术落后有可能拖整个国民经济后腿的趋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知识,重视科学技术。为了使中国科学院从派性纠缠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头单位,1975年7月初,邓小平选派了曾经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去整顿科学院。

胡耀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共分6个部分,主要内容是:(1)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要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可行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2)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3)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研机构。(4)自力更生,又不闭关自守。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5)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6)落实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个文件。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就科学院有关问题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说:“农业拖工业的后腿,科研是拖整个的后腿”。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指出,“科技工作要进行整顿,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要看到科研也是生产力”。对于排斥业务的作法,邓小平表示了极度的愤慨,他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一

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可以提升当所长。对于要为科研工作创造条件，解除科研人员后顾之忧，切实解决“房子、车子、孩子、炉子、妻子”等具体生活问题，邓小平也非常重视。邓小平还强调，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要办好教育，学校应以学为主。指出，“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邓小平认为《汇报提纲》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邓小平的指示和《汇报提纲》传出之后，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由于毛泽东未表示同意，而没有下发。

1975年5月至8月，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按照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指示精神，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教师座谈会和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针对江青、张春桥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例如：他说：“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象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和评论。这些文章和评论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批评了反对以学为主的错误认识和“以干代学”的实用主义主

张。

9月26日至11月8日，周荣鑫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周荣鑫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精神，邓小平说：“25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科学研究工作后继有人问题，中心是教育部门的问题。现在有个危机——不读书。教师有个地位问题。教育部门也有个调动教师积极性问题。”后来由于周荣鑫遭到迟群等人的迫害，这个汇报提纲未能成稿。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江青一伙的把持，文艺的贫乏使全国人民忍受着精神饥渴，百花凋零。文艺也需要整顿。1975年7月，邓小平为此问题与毛泽东进行了蹉谈，毛泽东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7月14日，毛泽东作了文艺问题的书面谈话：“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7月18日，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张天民分别给毛泽东、邓小平写信，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片《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的“10条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建议重新上映。25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早在2月间，江青看过《创业》后

就指责《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并授意于会泳等人捏造《创业》的10条罪状。批示下达后,他们抵赖10条罪状是他们搞的。直到9月第一次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还大骂张天民谎报军情,胁迫张天民再给毛泽东写一封信,承认《创业》影片有错误,要求不向国外发行。同时,又私下散布谣言,说“毛泽东同志没有看过《创业》”,批示是邓小平“有意强加给主席的。”1975年,毛泽东还批准了关于研究和出版鲁迅著作的建议,批准出版《诗刊》、《人民文学》等文艺、学术刊物。邓小平批准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一伙作为“毒草”而禁锢的电影。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在群众中四处流传,人们拍手称快,希望通过文艺调整,使被“文化大革命”窒息的文艺有所复苏,使文艺园地百花齐放。

在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指导写出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8月,为了阐明和宣传整顿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长文原拟在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名义筹办的新刊物《思想战线》的创刊号上发表,10月中旬写出初稿,以后又作了较大修改。文章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总纲,而发展生产、实现四化宏伟目标是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文章说: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

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章还说: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泽东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生产力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文章还揭露了江青一伙“‘革原来革过命的命’,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和纵容武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并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甚至对敌斗争也不容许的方法,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指出,“我们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

《总纲》实际上是以发展生产为纲,说明了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批评了江青一伙的“左”倾错误。

邓小平从1月5日复职,在短短的八、九个月里,对军队、党风、工业、交通、农业以及科技教育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整顿,切中时弊,抓住要害,在短时间内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得到制止,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基建投资总额409.32亿元,增长17.7%。铁路货运量8.67亿吨,增长12.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71.1亿元,增长9.2%。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表现了他的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魄力,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唤起了全国人民的觉醒,加速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灭亡。

4.3 “反对经验主义”的背后

在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同时,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观点和有关谈话,掀起了一场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左”倾学习运动,直接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相对抗,企图使整顿停滞。在这场运动中,江青一伙鼓吹“反经验主义”,矛头直指邓小平,遭到邓小平的抵制和斗争。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度变更了。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谈,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些观点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某些论点的误解和教条化,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在经济方面的继续发展。他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从维护“文化大革命”出发的,反映了他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忧虑。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的通知,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央通知说:“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知要求将毛泽东的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通知发出后，全国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并且在按语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张春桥、姚文元组织摘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毛泽东批发的。它在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进行理论论证。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很合江青一伙的胃口，他们打着宣传理论指示的旗号，大肆活动，发表文章和讲话，来制造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党政领导干部的新的舆论。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他还把林彪的错误也归结为“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张春桥说，在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过程中，必须警惕苏修“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的教训。

在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登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反复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说：“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泽东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21日，《人民日报》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中，根据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的口径，再次引用毛泽东1959年关于经验主

义是主要危险的语录,并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4月1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说:“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把这篇文章奉为“张春桥思想”。

4月4日、5日,江青在宣讲张春桥的文章时,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还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江青一伙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真正反对经验主义,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借批经验主义之名把攻击矛头指向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同志,特别是指向邓小平。

在江青一伙的操纵下,反“经验主义”的鼓噪一阵紧似一阵。一时间,这类文章和新闻报道塞满了报刊,有的甚至整个头版的篇幅都在大反“经验主义”。反“经验主义”的典型也被炮制出来了,其中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一个工厂里搞的一个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就被他们当成宝贝到处散发。他们还指使有的地方召开什么经验交流大会,为反对“经验主义”大造声势。

1975年第3期的《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文章《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文章指出：“因循守旧从来就是进行革命的巨大阻力，从孔丘到林彪，一切反动派都利用因循守旧思想，反对社会变革，复辟旧制度。”文章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是“经验主义”、“因循守旧”、“复辟旧制度”。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文，文章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3、4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发表了反“经验主义”的文章。组成了一个借口反对经验主义的、矛头对着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有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老干部的大合唱。

在造成反“经验主义”的声势后，为了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姚文元指使新华社向中央写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称：“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作了如下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1975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很长时间毛泽东没有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他在地休养了10个月，刚刚回京。这是回京后第一次与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所以毛泽东讲得很多，谈兴很浓。

会议开始，毛泽东说：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开门见山，把今天谈话的主题端了出来。毛泽东这里讲的文章就是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就是指那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

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还说：“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5月27日，初夏的北京，街道两旁的树木枝叶繁茂，绿葱葱的。这天，邓小平根据毛泽东5月3日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

按照惯例，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坐在一排，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坐在对面一排，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邓小平说：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的同志安定团结。毛主席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实际讲宗派主义，讲“四人帮”的问题。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对主席5月23日批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是搞突然袭击，搞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无非是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这没有什么过。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当时钻出一个

“11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几件事雷厉风行。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邓小平还针对“四人帮”强调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宗派，“四人帮”值得警惕。他还强调纪律，说不要以个人名义送材料。

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在发言中向江青一伙提出质问和批评。

6月3日，政治局又一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

九大之后，江青集团“笔杆子”与林彪集团“枪杆子”在权力分配上发生了尖锐冲突，毛泽东支持了“笔杆子”，使林彪集团垮台。毛泽东常常赞赏江青一伙“反刘、林有功”。但是十大以后，江青一伙走下坡路，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多于表扬；批评江青一伙的“11次路线斗争”、“三箭齐发”、“反经验主义”活动，更指出了他们是“四人帮”。这些批评把江青一伙压得有些抬不起头来。因此，在政治局开会批评他们时，他们采取了权宜之计，不痛不痒地检讨一番，以后寻找机会再反击。连平时大喊大叫的江青，这次一反常态，有所收敛，而她内心却咽不下这一口气，等适宜的时候再算帐。

6月3日的会，王洪文做了点自我批评。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他。关于反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但对社论、新华社报告都看了，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以后要

好好学习。要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办事。对27日的政治局会议的看法,他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王洪文有二个保留,一是认为确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二是说11月会议批周恩来,决不能因为批评江青而否定这次会议,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也发了言,她说27日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她有体会。有些问题还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做进一步检讨。

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一伙,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唯一的一次。不久,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肯定了会议有成绩。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迫于毛泽东批评的压力,为了避避风头,江青写了一个书面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张春桥见江青写了书面检查,他也写了一个自我表白: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张春桥的这个“自我表白”，当时并没有上交政治局，1976年逮捕他时，从他的住所搜出来的。

江青一伙利用“反对经验主义”干扰破坏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正常工作的阴谋破产了，在一段时间内，江青一伙有所收敛。这给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4.4 评《水浒》，直射周、邓

江青一伙的野心是不会完全遏制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抓住机会，妄图给邓小平以新的打击。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中国史书。在他晚年，眼睛得了白内障，不能看书，需要别人给他读书。1975年8月14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叫声荻的女教师，在给毛泽东朗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后又谈到《水浒》。

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记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会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写在前面。

本来这是属于个人之间交换对艺术作品的看法，毛泽东并没有讲到要搞什么运动之类的话。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讲到《水浒》时，完全是作为学术问题探讨的，在讲述的过程中，他老人家旁征博引，谈笑风生。毛泽东关于《水浒》评价问题的话，决没有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掀起批判《水浒》、掀现实生活中宋江的运动的意思想。

江青一伙得知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后，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姚文元坐在办公桌前，眼睛盯着毛泽东的这几段300来字的谈话，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考虑怎样把这些评论与现实斗争联系起来，作为攻击邓小平等人的靶子。

姚文元考虑成熟，动手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还提出将毛的批示和他写给毛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委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江青一伙加紧暗中活动。8月下旬,江青向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述说了她那伙批《水浒》的想法,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

姚文元组织人马撰写文章。经过秘密策划,8月3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篇幅,刊登了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敲起了江青一伙利用评《水浒》进行反党活动的开场锣鼓。《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说:“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评〈水浒〉》说:“在社会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述,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号召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讨论。此后,他们的写作班子陆续抛出各种文章,掀起了一场评《水浒》的运动,以批投降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评《水浒》运动的发动是江青一伙开始反扑的标志,江青又猖狂起来。9月12日,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讲话,对《水浒》问题大放厥词,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把

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还充满杀机地说，“我每天要打拳哪！‘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所以，不要把学评《水浒》看成是文艺界的事。”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召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两校写作班子100多人谈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江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了。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不敢作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答复：“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江青一伙控制的报刊及其他舆论工具，竭尽影射攻击、造谣诬蔑之能事，他们在“联系实际，评论《水浒》”的幌子下，叫嚷要“揪宋江式的走资派”，批判“投降主义”。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许多地方刮起了一股揪“投降派”，抓“活宋江”的妖风，打击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

评《水浒》从9月份开始，一直延续下去，实际上为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舆论准备。这个所谓评《水浒》运动，颠倒是非，不顾事实，违反党心民心。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所谓评《水浒》运动也随着江青一伙的垮台而告结束。

198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 1975 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决议》指出：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五、打不倒的巨人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始末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对这种状况，毛泽东不容许，江青一伙为了达到自己的险恶目的更是猖狂反对。因此，当全面整顿方兴未艾之时，1975年冬形势发生逆转，毛泽东在江青一伙的挑唆下，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转向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整顿刚刚取得成效，即遭破坏。江青一伙利用这一运动，推波助澜，将左倾错误推向极点，把党内一大批老干部作为专政对象，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步伐，也加快了他们覆灭的步伐……

5.1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形势一天比一天好。可是在寒冷的冬天到来之际,突然刮起一股“批邓”风。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此,邓小平是早有了思想准备的。他在1975年9、10月间就整顿工作多次针对江青一伙的攻击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拚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针对江青一伙利用《水浒》大作文章,邓小平在9、10月间部分省委书记会上讲:“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1975年,毛泽东82岁的高龄了,病情日重,别说巡视大江南北,就连说话走路都很困难了。出席会议、接见外宾日益减少,与外界联系很少,需要一个联络员。江青推荐了毛远新。江青与毛泽东分居后,一直担心无法接近毛泽东,为了瞒上欺下、操纵形势的需要,于1975年9月把毛远新送到毛泽东病榻前,充当一名特殊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他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后来爬上了沈阳军区副政委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当了毛泽东的联络员后,住进中南海,凡事都由他来上下传达了。政治局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当时

政治局的同志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不太满意,但为了顾全大局,也为了毛泽东的身体健康,一直采取克制态度。

从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攻击邓小平,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谋面讲得一大堆。

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要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是不容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一直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重大贡献,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到“文化大革命”后

期,他虽然觉察到这场运动的一些缺点,但仍然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必须“三七开”。这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评价,毛泽东到去世也没有动摇和改变。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状态整顿好,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党的工作纳入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的轨道,虽然这一切是在“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下进行的,但从本质上说确定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毛泽东当时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他从自己的“左”倾思想体系出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而邓小平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反而被认为是脱离了阶级斗争的“纲”。对邓小平强调要克服派性,批判派性,对捣乱的造反派头头要批评,不听的要调动工作,严肃处理,毛泽东也是不满意的。他提出:“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不久前康生带病受江青之托前来“告状”,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倾翻案”。以后又接二连三地给毛泽东吹风。为此,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二次,邓小平有自己的想法,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所以,对毛远新的看法,毛泽东是肯定的。他认为,这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账。”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把他的意见讲出来。

邓小平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认错,他说:“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天(即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

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过了两天,毛泽东又指示毛远新布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邓小平是强硬的“钢铁公司”,不让步,拒绝了。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合。中央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

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一个导火索。清华大学的负责人迟群干了不少坏事,特别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充当江青的特使奔走四方,上窜下跳,还掌握梁效写作班子,大写黑文,影响恶劣。迟群自以为有功于江青,在四届人大上不捞个副总理,起码也要捞个教育部长当当。没想到四届人大继续由周恩来组阁,邓小平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迟群的部长梦未实现。于是他牢骚满腹、消极怠工、酗酒胡闹,影响极坏。1975年8月13日,中共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以及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联合给毛泽东写信,揭发迟群的问题:迟群的个人野心没有满足,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信中还揭发了迟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10月13日,刘冰再次给毛泽东写信,继续揭发迟群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人。还揭发迟群假左真右,以及与谢静宜大搞阴谋活动等问题。这两封信均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党员有向上级组织及上级领导人反映问题的权利,可是这封信却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作了不切实际的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是: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

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江青一伙见到这个批示，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抓住战机，向邓小平发起进攻。以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清华先后召开了有 1300 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批判刘冰和教育部长周荣鑫，把矛头对着邓小平。公开提出“邓小平是刘冰的总后台，刘冰是邓小平在清华的代理人。”分管教育工作的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11月8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教育整顿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会后，清华大学贴出大批大字报，北京大学也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江青一伙不会满足于在清华和北京一地刮黑风，而是想方设法地把黑风刮到全国。外地一些省市奉命组织干部、群众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江青一伙还指使各地党羽大量翻印清华大字的大字报，四处散发。两校的大字报迅速在各地不少学校传抄，一些学校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以此为起点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开始了。

5.2 “教育革命大辩论”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首先在教育战线掀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

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

了有 130 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中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紧接着，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打招呼的讲话要点》。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介绍了清华大学开展教育大辩论的情况。中共中央的批示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报告》下发后，“教育革命大辩论”推向全国。周荣鑫、李琦等教育部负责人受到追查和批判。

12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 12 期发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12 月 4 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转载。文章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

12 月 20 日，中央转发了一份《外交通报》，张春桥于 11 月 30 日向阿尔巴尼亚人士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他对“文革”前 17 年教育所作的估计是：这 17 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 17 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

江青一伙篡夺了教育部的领导权，推广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经验。1976 年 2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朝阳

农学院委员会的文章《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我们在哪些重大问题上坚决同 17 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文章把“文革”前的学校称为“旧学校”，并总结了他们与之对着干的十个方面的经验。1976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23 日，教育部分三批召开 29 个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推广辽宁省 1975 年高等学校试行“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的“三来三去”经验。认为这个经验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深入教育革命，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重要措施之一，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1976 年 2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 2 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6 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29 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3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 3 期发表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文章把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鼓动各条战线开展反击；把邓小平关于提拔专业人才到领导岗位的正确意见批判为“专家治所”，提出要在科技界实行专政；把“三项指示为纲”，说成是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实现四化污蔑为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把邓小平称作“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早在 2 月 1 日，江青就布置赶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她要于会泳等人赶快布置将与“走资派”斗争的电影改编为京剧，配合当前的斗争。6 日，张春桥向于会泳下达写与

“走资派”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任务。16日，江青对《人民日报》上吹捧《朝霞》丛刊《序曲》的文章作了批示，要求把该书一些写“走资派”的作品改编为电影、戏剧。于会泳等人立即落实。3月16日至23日，文化部召开了“制作座谈会”，于会泳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并且布置了20部与“走资派”斗争的影片创作规划。6月，影片《反击》、《盛大的节日》、《千秋业》开始拍摄。7月1日，《欢腾的小凉河》上映。《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是江青一伙“阴谋文艺”的代表作。

5.3 巨人，在风雨中屹立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批准。《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一些内容如下：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二个错误,1. 打倒一切,2. 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华国锋在会上代表党中央讲话,他要求大家回去以后把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放在首位,在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同时,中共中央转发了华国锋的讲话。“批邓”的问题正式在党内公开。

华国锋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被毛泽东重用的。1976年1月8日,北京,数九寒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阴冷得令人忧郁,更加重了人们内心的压抑感。上午9时57分,周恩来

这颗巨星陨落了，神州大地为之悲哀，全国人民为之痛苦。1975年12月6日，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邓小平赶来，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周恩来抬起头来，望着站在手术车周围的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和张春桥，大声称赞邓小平：“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在这生死离别的最后一瞬间，周恩来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支持邓小平做的一切，对邓小平寄予了殷切厚望。但他心里也明白，江青一伙正围攻邓小平，毛泽东也出面批评邓小平，邓小平处于危急之中。

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谈到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从此以后，华国锋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了，邓小平靠边站。

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全党：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一位外国传记作家评论道：

妄图操纵患病的毛泽东的“四人帮”，当然不是想为华国锋这位人们不大熟悉的“外地”政治家掌权铺平道路。但是他们疯狂地反对邓小平无疑有利于华国锋的晋升。邓小平的坚定务实的精神使毛泽东感到不安，因此，从1975年秋起再次把矛头指向邓小平。但他清楚地了解其夫人及上海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在幕后搞阴谋活动，并有政治野心。“四人帮”垮台后公布的语录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的有利条件正是在于他不参加任何一派，而是长期无限忠于毛主席。

在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1976年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12省、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诬蔑我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是汉奸行为;攻击搞四个现代化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攻击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修正主义王法,是搞“管、卡、压”;攻击要求增加社会主义积累是利润挂帅;攻击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政策和措施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是走专家路线,叫嚷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等等。在讲话中,污蔑攻击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大汉奸”、“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她还流露出当“女皇”的野心,说什么“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3月10日,毛泽东批示:江青干涉太多,单独召开12省讲话。

江青一伙授意其写作班子在报刊上抛出一篇又一篇文章,攻击邓小平。1976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孔丘其人》,说:“在去年夏季前后那股右倾翻案风中,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孔丘的幽灵还在游荡吗?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2期发表《从〈宣和遗事〉看“元祐更化”》、《回顾20年代苏联党内的一场大辩论》,攻击邓小平同托洛茨基一样搞的是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黑货。3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影射邓小平和司马光一样,“一上台,就借‘整顿’为名,放手干他的复辟倒退勾当。”3月6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梁效的《“克己复礼”再批判》,影射攻击邓小平扼杀新生事物,恢复旧的制度。《学习与批判》杂志连续登载了《梯也尔小传》、《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司马光登台一年》等文章，对邓小平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江青一伙为了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打倒老干部，提出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1976年3月1日，经姚文元审定的池恒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转载。3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两篇文章污蔑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论证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文章说：“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过的道路吗？”这个反动公式，是江青一伙制造出来的。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老干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在中央2月会议期间，张春桥召见在上海的亲信，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研究现在的阶级关系；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2月底3月初，在王洪文、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等人的组织下，上海市委召开了大型的“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所谓“老干部变走资派”的问题。4月初，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经张春桥审阅批准，徐景贤作了“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长篇讲话。

江青一伙还提出了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为他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提供理论基础。1976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将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的一个批示印发党内，这个批示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中央报刊上先后发表

了池恒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梁效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方刚的《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斌音的《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批判邓小平在军队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等等污蔑攻击邓小平的文章。“批邓”运动实际上为江青一伙所掌握，按照他们的观点和意图进行。上述发表的带有全面指导性的大批判文章，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组织、授意、审定的。他们狂热鼓吹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党内有走资派，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主体。这个理论还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外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逐步削弱了，他们不可能集中起来同无产阶级全面较量。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走资派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党中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党内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因为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内有一部分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

江青一伙特别强调，邓小平被打倒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打倒一批老干部。迟群在几次讲话中就露骨提出来，“有一层人势力很顽固”，“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一级盯一级，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仍然会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江青一伙还掀起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浪潮。所谓“三株大毒草”是未定稿的《论全党

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要害深入批邓》,把三个文件诬为“三株大毒草”,说成是“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把《论总纲》攻击为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把《汇报提纲》攻击为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说成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根据江青等人的意图,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3个小册子,发行了几千万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又称《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从8月13日到10月6日江青一伙覆灭,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有110篇之多。江青一伙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不仅是为了维护其反革命“左”倾错误,而且也是为了实现他们妄图彻底打倒邓小平的险恶用心。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批判,遭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在基层未发动起来。这三个文件未公开发表过,通过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批判,广大干部和群众反而了解了其中的内容,普遍予以肯定和称赞这三个文件搞的好。广大干部群众争相传阅、齐声叫好,不少人由此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进一步认清了江青一伙人的恶劣本性。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面,全国再度陷入混乱。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本来已经取得成效,又被中断了;全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本来已经

好转,又被打乱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做法本来已经开始纠正,又被恢复了。经过近十年的动乱,这时候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越来越看清江青一伙的祸国殃民的面目,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了抵制,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不得人心。广大人民群众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不断积蓄和发展着,如同一座火山,即将爆发。

六、洒向神州都是泪

——巨星陨落备忘录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龙年,是中华民族的“本命年”。

1976的龙年是中华民族的“悲痛年”。

巨星陨落,江山易容,流水失色,洒向神州都是泪!

1月的哀思,7月的悲痛,9月的泪水,演成了龙年不堪其重、不堪其悲的主旋律……

6.1 夕阳笼罩在西花厅

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患了癌症。

从此,夕阳爬上了主人日夜操劳的所在——中南海西花厅。

但西花厅的灯依然是中南海最晚熄灭的一盏。

“大江歌罢掉头东,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伟气魄在灯光

闪烁中隐约可见,但总理毕竟迈入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段落。

“为了中华之崛起”,这是总理少年时的冲天豪言。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总理拒绝了医生“暂停工作”的劝阻,仍然重复着那几十年如一日的每天 12—16 小时的超负荷高速运作!

或许,还是因为这个,总理竟忍住了那巨大的阵痛,在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保持着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

对待绝症,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哀,他对医生说道:

“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就这一句话,这位绝症的老人又连轴运转了长达 2 年的工作期!

6.2 忍辱负重为中华

这是一颗不屈不挠的意志之星。

他雍容自若,沉着坚定,安祥而又充满活力。

当他艰难备尝,苦撑危局的时候,一阵阵寒流却无端地向他涌来。

1973 年,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其意在“周公”的运动。

1 月 25 日上午。首都体育馆。江青授意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正在进行。

江青在耀武扬威地讲演:

“革命同志们！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地联系实际！”

“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

“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

……

接着是谢静宜（当时的身份是北大党委书记，女，时年30岁）含沙射影地讲演：

“今天，我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讲讲批林批孔问题。”

“孔夫子是个儒家，不是法家。长期以来，他是保守势力的代表。”

“这种保守的反动的思想，阻碍着革命的发展。不批臭它，中华民族就不能前进。”

……

“代表保守的反动的孔老二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我们要坚决批臭这种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多高，威望多大，都要把他坚决拉下马……”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总理“让位”！波及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四人帮”的运筹下变成了矛头直指周总理的“批周”运动，周恩来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这压力与其颇显倦态的身体比照显得格外的沉重！

但总理依然在任劳任怨地操劳着，他深深知道，一旦他稍作停息，这对中国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西花厅的灯光依然长明……

6.3 西华厅,让我再看你一眼

1974年6月1日12时,周恩来总理看了西华厅最后一眼,依依道别他工作25年之所在,首次赴医院接受治疗。

实际上,从1973年冬开始,总理的病情便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

1974年4、5月,在沉重而繁忙的国事和外事活动中,总理终于支撑不住了——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

5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同日,他向秘书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6月1日他才住进了医院。

同日,在解放军305医院,周恩来作了第一次大手术。

手术是在十分保密的气氛中进行的。执刀的医生把对总理满腔的挚爱倾注入那银色的手术刀上,手术作的十分顺利。

手术完毕,总理在安然地沉睡。

几个时辰过去,总理缓缓醒来,上下嘴唇在艰难的蠕动,似在呼唤什么。

“李冰,李冰……”屏住呼吸,靠近总理的嘴唇,护士才听到总理是在呼唤李冰——主刀大夫,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的医生。

李冰应声来到总理的身旁,轻声说道:“总理,是李冰,我来了。”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总理艰难地问道。

“知道。”李冰轻声答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声音短促、声微却有力！

人们随时都可以从伟人那儿得到启迪，哪怕在他默不作声的时候。

心为一切人而跳动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

6.4 拥抱死神，力挽狂澜

1974年，总理的生命已经到了倒计时的时间。

但他依旧在拥抱死神，力挽狂澜！

9月30日晚，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

在人们焦灼地期待中，周恩来总理步入了宴会大厅，全场轰动了！

有位作家作了这样的描述：

“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1974年10月开始，为筹备四届人大，粉碎“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总理置死神于度外，又开始了连正常人都无法承受的日夜操劳！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于是，围绕四届人大的人选问题，“四人帮”借“风庆轮”事件发难，实施其“倒周批邓”计划。

“风庆轮”事件始末如下：

1974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李国文，奉命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李任政委，顾任政治干事。“风庆”轮开船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李、顾拒绝，并郑重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地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四人帮”亲信捕捉到这一“动向”后，连忙赶制了一封10000多字的信件，指责李、顾二人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四人帮”也小题大作，大加渲染。江青在对该信的批示中诬陷交通部“崇洋媚外”，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张春桥、姚文元宣称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王洪文指示“先把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船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风庆”轮事件。江青带头发难，提出“风庆”轮事件是“崇洋媚外”，并逼邓小平表态。邓小平表示“我要调查。”邓小平不卑不亢的态度惹恼了“四人帮”，他们狂呼乱舞：“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不屑与其辨议论，提前离场。

“风庆”轮事件惊动了卧病在床的周恩来。在仔细了解了“风庆”轮事件的由来后，总理招来毛远新，郑重表态：“风庆”轮事件并不象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

10月20日,毛泽东也郑重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国家安危的紧要关头,周恩来不惜以“小我”的牺牲求得“大我”的稳定和后继有人。

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及江青、王洪文谈话,郑重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11月6日,周恩来亲笔致信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并以拳拳之火“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12月23日,周恩来飞抵长沙,面见毛泽东,详细汇报四届人大筹备状况。此时,总理大便出现隐血,身体已每况愈下。

在长沙,总理呆了5天。两位革命老人促膝而谈。谈话要点如下:

第一,毛泽东劝周恩来安心养病,总理希望主席“健康日好”;

第二,毛泽东再度称赞邓小平“人材难得”;

第三,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

1974年12月末到1975年初,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要点。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四届全国人大在京召开。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总理重申了1965年初三届人大提出来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

四届人大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从而形成了“周一邓”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体制，宣告了江青组阁计划的彻底失败。

6.5 “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

四届人大以后，总理的病情再次加剧！

他那睿智之光已探测到离他并不遥远的死神脉搏，

但他依然豪情满怀，目光炯炯，象迎接朋友一样迎接死神。

死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拿出勇气活下去才是勇者。

谁都免不了一死，与其在世上偷生苟活，拖着日子，还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

总理的品格在死神的面前显得格外的悲壮和美丽，

倒计时，总理开始与死神比赛！

1975年3月，总理在与侄女周秉德通电话时宁静地说道：“这（死亡）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

1975年5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看望谭震林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

同月，周恩来对其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你们一定要把我

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

5月3日，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席再次批评了江青搞“四人帮”的问题，并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6月9日，周恩来抱病赶赴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总理破例地对贺龙遗像7次鞠躬，并对贺龙的夫人薛明连声说道：“没有保护好他”。嗓音哽咽，悲痛之情溢于言表。薛明颇识大体地恳求总理保重身体，周恩来听后无比沉重地说：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此话一出，举座震惊，愁云密布，泪水横洒！

7月1日，周恩来强撑病体与泰国总理克里·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当仪式结束，周恩来与巴莫离开签字台，起身与记者会面时，一部分工作人员恳请总理与他们合影留念。周恩来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同时说出了一句沉重的不能再沉重的话：

“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

一时无语凝咽！悲凉之雾扑面而来。

8月26日，总理挺身会见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等柬埔寨领导人，希望他们之间能够加强团结，巩固胜利。

9月7日，周恩来再次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会见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席间，当客人问候他的身体状况时，周恩来洒脱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这里的副总理是指邓小平同志。

据考，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与外宾会面。

.....

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至9月间,周恩来总理置个人病痛于度外,为了国家的安危,先后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他人4次。

6.6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

生命之灯开始黯淡了!

1975年9月后,总理与死神的搏斗进入了最后一个周期!

残忍的癌细胞无情地吞噬着他那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的千金不易之躯,总理垂垂老矣!

9月,周恩来的体重已由130多斤骤降为几十斤。

9月20日,又一次手术开始了。手术中严酷的事实开始暴露出来:癌瘤已全身扩散,无法医治!

与此同时,苦撑危局的邓小平沉痛地下达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下旬,不得已的手术再次施行,在即将进入手术台之前,周恩来勉为其难地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喃喃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12月6日,周恩来作了他的第13次手术,也是最后一次手术!

当“无力挽救”从回天乏术的主治医生口中说出来后,叶剑英元帅一再指示吴阶平等医生:“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12月，周恩来叮嘱叶剑英等人：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12月中旬，周恩来已无法进食，全靠输液延缓生命。他“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

12月20日，周恩来与他的老部下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谈话几次被剧痛所中断。总理最后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

12月底，有人告诉周恩来说给他理了几十年发的朱师傅几次恳求前来给总理理发，总理听后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20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年元旦，周恩来与身边的医护人员一道收听着广播中朗诵的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写下的那首气势磅礴的词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同年秋写下的《念奴娇·鸟儿问答》。

总理的心绪随着广播员庄重的语调而起伏：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许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1976年1月的头几天，周恩来已处于弥留之际，病情在无可遏止的恶化。

极度的剧痛中，总理以微弱的声音吟唱着国际歌，他对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大姐断断续续地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7日，周恩来陷入了昏迷的黑夜之中。

晚11时，总理缓缓醒来，奇迹般地认出了守候在旁边的吴阶平医生，他拚力说出了他最后的“遗言”：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1月8日上午9时57分，死神终于夺走了总理极其宝贵的生命！

6.7 讣告一声天下惊

1976年1月9日，关于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经由各大新闻媒介传遍了神州大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

8日下午3点左右，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由政治局派专人送达毛泽东主席处。

护士孟锦云含着眼泪，抽泣地读着讣告，毛泽东紧闭着双眼静静地听着。小孟注意到伟人那双闭着的眼睛中流出了滚烫的泪水……

1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1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总理的遗体作最后的道别。

1月11日，群众性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这天下午，天阴地暗，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怀着对周恩来总理的敬爱，伫立在从长安街到八宝山的街道上，形成了空前的送“灵”队伍。

当下，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下午，周恩来的遗体要送往八宝山去火化了。灰暗的天空压着沉沉的云层，整个北京城是那样肃穆宁静，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人们伫立在几十里大街的两旁，冒着严寒等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傍晚，悲壮的哀乐送来了总理的灵车。人民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着，从心底呼喊：“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您啊！”总理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灵车啊，你停一停，让我们再看一眼周总理亲切慈祥的面容！司机啊，你刹住车，让我们再向周总理诉一诉衷肠！夜深了，风紧了，总理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数十里

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归来的灵车。但是，只见灵车回，不见总理归。止不住的滚滚热泪再一次洒满几十里长街……这是古今中外从没见到过的送灵场景啊！”

1月12—14日，首都群众4万余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

与此同时，关于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委员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等一杆子文件送达毛泽东主席处。

当秘书张玉凤轻声问道：“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时，毛泽东拍打了一下已难以站立起来的腿痛苦而又无奈地说：“我也走不动了。”

1月14日下午，护士孟锦云给主席读着邓小平致的悼词清样，主席仍旧闭着眼听着，听着，动情处，不禁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1月15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商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

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

这是邓小平第2次复出时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邓小平滚落脸庞的泪珠！

一位著名词人在当夜写下了下面的词作，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人的心态：

雷击苍生，夜难晓，彤霞渗血。天何忍？未亡腐恶，先亡俊杰！我辈青春随逝去，同伦白首堪言诀？梦魇惊，心碎猛捶胸，

狂风咧！

谁无泪？眶枯竭；谁无语？喉哽咽。江声涛泪浪，欲掀天阙！赤悬山崩擎柱铁，黄钟玉毁扶轮月。民族魂，大地不能埋，海难灭！

1月16日，遵照周总理生前遗愿，周恩来的骨灰撒落在祖国的山川江河大地……

6.8 “恩来，恩来在哪里？”

周恩来不幸逝世的信息及时传到了朱德委员长处，老人震惊了！

年届90岁高龄的朱老总“两眼直直地望着天空，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不时地念叨：“恩来，恩来在哪里？”

1986年，康克清大姐回忆说：“我和他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掉泪。”

1月11日上午，朱德委员长抱病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总理的遗体作最后的道别。那一晚，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扶着手杖的朱老总，举起颤抖的右手，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老总噙着泪水送别了有着长达54年深情厚意的亲密战友。

从此，老总已难见丝豪笑容，气色也日渐看老……

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大会。

老总是坚持要到会的，当秘书前来问询的时候，老总肯定地回答：“去！当然去！”

但老人却已走不动了！

巨大的悲痛、年迈的躯体、疾病的吞噬、无尽的哀思，老人

的双腿在15日这一天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

老人喃喃而苦痛地自语：

“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老人无可奈何地把目光投向了电视：

“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

6.9 “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

“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

这是朱德委员长在他临终前的几个月中经常念叨的一句话。

——1976年2月，朱老总语重心长地对人大常委会几位负责人说：“总理不在了，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不然，我们既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总理。”

——1976年3月，老总收到一封揭发“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来信，当下便转呈毛泽东主席：“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请主席酌处。”

——面对家人、同志让他多多休息的奉劝，老总一再表示：“休息？把党和人民委托给我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好的休息。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容稍有松懈。你要我休息，我还要挂帅出征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多注意注意共产主义运动。”

——1976年5月20日，成仿吾把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寄给老总，老总即刻翻阅，爱不释手。21日上午9时，老总

亲临成仿吾处座谈并称赞成仿吾“做了一件有世界意义的工作”。

——1976年5月下旬，朱老总的肺炎复发，身体极为虚弱。但他依然在忘我的工作。

——1976年6月12日，朱德委员长坚持着会见了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

——1976年6月21日，老总病情加剧，但依然不肯改变原有安排，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

——1976年6月25日，医生决定让老总即赴医院治疗，老总却坚持说：“不要紧嘛，等明天我接见完了外宾，再去医院也不晚。”

——1976年7月1日，朱德病情恶化。但他依然非常清醒，他叫来秘书，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1976年7月3日，李先念同志前来看望老总，老总此时吐字已非常艰难，他吃力地拉着先念同志的手，叮嘱道：“你要抓经济！……我们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也只能上，不能下！……无论如何也要把生产搞上去！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1976年7月初的几天，朱德对与他相濡以沫几十载的革命战友和伴侣康克清同志也说了一些话：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虽然出现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林彪、‘四人帮’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则更是反对他们一伙的倒行逆施，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不管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对革命都要有坚定的信心。”

“几十年来，我尽心尽力地去工作，去战斗，扪心自问，对党对人民是无愧的。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咱们的晚辈。如果将来晚辈们的思想染上了恶习，经过多方教育，仍然不肯悔改，那你就同他们脱离亲属关系，免得他们打着招牌做坏事。我们积蓄的钱，你要全部交给党，不给子孙留下分文……”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委员长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康大姐在1986年回忆说：“他是抱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人世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因为他希望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可惜都没有能够如愿……”

6.10 “花开花落两由之”

1971年，是毛泽东主席身体由盛转衰的分界线。

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呼声中，不可抗拒的“生老病”自然法则开始在这位巨人的身上施开了魔法——从1971年春天起，主席每逢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都是较为严重的老年性疾病。

开始只是由感冒引发的支气管炎，后来逐渐加重，医生诊断为“大叶性肺炎”，嘱其忌劳累过度和吸烟过量。

然而主席依然故我，日夜操劳不听劝阻，烟也抽得特别凶。他诙谐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生的话只能信三分，最多信一半”。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毛泽东虽然极为豪迈地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背叛的确给了这位伟人致命的一击！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不幸逝世。

1月10日，毛泽东亲赴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毛泽东紧紧握住张茜同志的手，哽咽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转身，毛泽东又勉励陈毅的四个孩子说：“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接着，毛泽东向覆盖在鲜红党旗下的陈毅骨灰盒三次鞠躬。

这次公开露面，人们惊讶地发现主席老了许多，最明显是那双随时都有可能支撑不住的双腿！

同月，毛泽东再一次病倒了，乃至于休克。

此后，中央作出决定，由周总理、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住所会见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一行。

后来，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回忆道：“他（毛泽东）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谈话结束后，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我回答说：‘不过你气色很好。’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1974年8月，毛泽东疲弱的身子又添了一项“老年性白

内障”，他开始感觉到两眼模糊，看起东西来十分吃力。

1975年春，北京著名的眼科专家汇聚一堂为主席会诊。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当主席听说一位医生叫“唐由之”时，毛泽东的诗兴被引发了，他有点费力地说道：

“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个‘由之’的名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主席颇有意味地背诵着。

1975年8月中旬，由唐由之大夫主刀给主席施行白内障摘除手术。

主席是踏着岳飞的《满江红》曲调迈进手术室的：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在这激昂的旋律中，人们感受到了这位伟人所特有的热与力……

手术如期进行。

手术获得成功。

1975年10月下旬，毛泽东的身体再度恶化，严重的语言障碍已使他难以清晰地表达内心的意思；没有护士的搀扶，他已难以走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去世，毛泽东沉浸在难以描述的巨大悲痛之中！

6.11 “我虽未盖棺也快了……”

1976年1月13日，毛泽东在病榻前召见华国锋、王洪

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作了重要谈话。

此时，主席依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语调断断续续，短促、轻微而沉重：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6.12 “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1976年春节，是主席最后一个春节。

在举家团圆万家乐乐万家的春节氛围中，毛泽东的春节就颇显得寂寞，冷清了。

没有客人，没有亲人，只有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在默默地陪伴着他。

晚饭也极为简单：武昌鱼外加一点米饭。

饭后的一段时光也格外的沉寂。终于，毛泽东从远处传来的一阵高过一阵的鞭炮声中醒过神来，他转头对几位工作人员说道：

“放点爆竹吧。”

“你们这些人也该过过节。”

一会儿，中南海游泳池旁边终于爆响了清脆的鞭炮，在不算浓烈的烟云中，主席以淡淡的微笑告别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除夕之夜！

6.13 巨星陨落惊天地

1976年3月8日。吉林。

一场举世罕见的陨石雨突如其来的降临。

是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星顺着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10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星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

15时1分59秒“火球”在吉林市郊区金珠乡上空发生爆炸。

陨石爆炸后，以幅射状向四周散落。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大屯乡李家村和永吉县江密峰乡一带；稍大块的直落在金珠乡九座村、南兰村；最大的3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偏南方向飞去。先后落在吉林市郊区九站乡三台子村、孤店子乡大荒地村和永吉县桦皮厂乡靠山村。

最后一块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冲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之外。

这次陨石雨散落的范围达480平方公里，其间包括吉林市郊区、永吉县、蛟河县的7个乡，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和损失。

据报载,中科院联合调查组在现场收集的陨石有 100 多块,总重量为 2600 公斤。其中最小的一块 0.5 公斤,最大的一块 1770 公斤,有 3 块每块超过 100 公斤。

.....

陨石的降落本是不多见但能够科学解释的自然现象,但在当时却引发人们种种的联想和推测.....

4 月 5 日,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逝世。

7 月 6 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30 万生灵之光刹那间毁灭!

9 月 5 日,毛泽东病危!

9 月 8 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

9 月 8 日晚,叶剑英向毛泽东行了最后的注目礼.....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一代伟人长眠不醒!

这一天,恰是秋收起义的 49 年纪念日!

6.14 洒向人间都是泪

1976 年 9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

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9月11日至18日,首都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参加吊唁和守灵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和首都群众30多万人,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港澳同胞,解放军各部队分别发来唁电和送来了花圈。60多个国家、政党送来了花圈。200多个国家、政党、组织以及著名人物发来了唁电或唁函。

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横贯天安门城楼的黑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毛主席的7米高的巨幅遗像,竖立在城楼红墙中央。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守护在遗像两旁。在城楼的前面,新筑起了追悼大会的红色高台,上面陈列着翠绿的松柏和淡黄的秋菊,陈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稻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

城楼下东西两侧的红台上,长青的花木丛中陈放着党政军各部门和29个省市自治区敬献的花圈。

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矗立着巨幅黑色挽幛,它以强有力的语气号召人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下半旗致哀。首都人民、党政机关干部和群众,从厂矿、企业、商店、郊区人民公社、部队营房、机关、学校和街道,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秩序井然地肃立在整个广场和东西十里长街上。

下午3时整，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宣布追悼大会开始。

全场肃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伟大的祖国在沉默，八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致哀。

与此同时，在祖国的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上，在江河海洋的货轮和军舰上，汽笛长鸣，声震长空，响彻环宇！

天涯此时，在炼钢炉前，发电机旁，手术台上，以及一切不能中断工作的战斗岗位上，人们用滚滚的泪水和汗水，用辛勤劳动的成果，悼念毛泽东主席。

八亿人民默哀毕，天安门广场上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雄壮的歌声响九洲。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

华国锋致悼词后，参加追悼大会的百万群众和全国八亿人民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

接着，天安门广场响起了气势磅礴的《东方红》乐曲。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追悼大会在下午3时半宣布结束。

全国各党政机关、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各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所有基层单位的广大党员和群众，普遍收听了首都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收听以后，全国县以上地区领导机关立即在本地区举行了有工农兵及其他各界代表

参加的追悼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在会上致了悼词……

6.15 “我不赞成把它改掉”

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决定》全文如下：

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教育和鼓舞工农兵和其他劳动群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定：

（一）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二）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

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拉法奇的采访时谈及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原委。

邓小平说：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

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死者的美好德行倘能为

每一个哀悼者深深地怀念，

他就堪称“永垂不朽”！

七、为了忘却的记忆

——唐山大地震备忘录

时间：公元 1976 年 7 月 28 日，北京时间 3 时 42 分 53.8 秒。

地点：东经 118.2°、北纬 39.6°，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唐山市。

在这一时间地点合成的四维空间中，如有 400 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 16 公里处的地壳中猛烈爆炸！胜似万盏夜明灯的电光在城市上空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惊雷震荡，狂风呼啸，大地剧烈震颤……

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中国北方重要工业城市在顷刻间夷为平地……

历史不应忘记这一时刻！

人们不应忘记这一历史！

为了忘却的记忆……

7.1 地震局,你怎么啦?

科学是发展的,但很慢,很慢,从一点爬行到另一点。

中国地震预测水平的局限,加之其他主客观原因,使我们未能准确预测震中,一场大灾难眼见着平毁了唐山!

中国的地震预测水平的长足始于 1966 年的邢台大地震。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时,诺大的中国仅有 3 位地震科学家:

李善邦——北京鹫峰测震台创办人;

傅承义——当代中国地震学权威;

顾功叙——中国地球物理事业。

1966 年 3 月 8 日,邢台发生 6.8 级强烈地震。

周恩来总理乘飞机亲临邢台,视察灾情,并指示地震工作者:

“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希望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作出贡献。”

地震的事实和变化本身赋予了人们难能可贵的感觉。

人们在邢台地震中创造了“小震密集→→平静→→大震”的感性预测方法,并以此预测(内部)成功了邢台 6 级余震。

中国的地震预测事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1975 年,中国的地震工作者成功地预测了海城地震,震惊了世界科学界。

1975 年 2 月 4 日,在震前 2 个小时左右,地震工作者准确地发出地震预报,使得百万余人安全撤出了震中区。据统计,在 6 个市、10 个县的震区内,城镇房屋毁坏 508 万平方

米,农村民房毁坏 86.7 万间,而死亡人数仅有 1328 人,占全地区人口总数的万分之 1.6。

这是中国地震预测史的辉煌记录!

1976 年 1 月 28 日,国家地震局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 1976 年地震趋势的报告》,内容如下:

——当前我国正处在地震活动的高潮阶段,估计近一、两年内大陆地区有可能发生 7 级以上的强震。

——目前有较多异常显示,可能发生较强地震,需要重点加强监视的地区为:(1)滇西北及川藏交界一带;(2)四川、青海、甘肃交界的四川松藩——茂汶一带和青海一带和青海的花石峡——都兰、乌兰一带。

——有发生 5—6 级地震背景的地区为:(1)京津唐渤张地区;(2)皖北,苏北,鲁东,豫东一带。

——从目前地震活动和前兆异常的空间分布来看,唐山与朝阳之间和京津之间两个地区尤应加强工作。

1976 年 6 月 5 日,北京市地震队耿庆国,敏感地发现北京地区气候出现异常:

——日降水量 6 月 29 日突破历年日降水量的最高值;

——月平均气温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连续 5 天突破历年同日气温最低值;

——日最高气温 7 月 1 日和 7 月 4 日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高气温的最高值;

——日最低气温 7 月 3 日、4 日连续两天突破历年同日最低气温的最低值。

——耿庆国的看法是:只等低压指标突破,就可能进入临震状态。

1976 年 7 月 12 日,唐山召开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

经验交流会。

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批判领导小组组长——“三胡”之一——胡克实，会议免去了胡克实领导小组组长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1976年7月13日，北京地震队接连发现八大异常现象：

华祥文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

耿庆国提出早震关系和短期气象异常；

李宣瑚提出水化学氡含量异常；

陈克忠、刘惠琳提出京郊大灰厂形变异常；

地磁场总强度异常；

地下水位异常；

地电异常……

同日，北京市科技局党委书记白介夫指示：要以临震状态投入工作……

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发生第29期工作简报，简报指出：

——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

——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北京市科技局）党委指示，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高度警惕当前地震前兆的发展和变化，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1976年7月17日，北京市地震队指出7月17—23日，在北京八宝山、紫荆关断裂带有四级左右地震，北京外围临近地区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26日上午8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与

北京市地震队会商。双方一致认为：情况严重，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但对京津地区如何报，感到不能轻率。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在听取汪成民等人的震情汇报，汇报稿上写道：

——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共收到对京津渤的预报计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项十分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昨天收到廊坊水氡自记突跳异常的报告，这种手段过去几次大震反映临震良好。情况值得重视。我们要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赶快研究一下。

会议争论激烈，意见不一。

最后，查志远副局长决定：

一、你们拿出京津地区的详细（震情）资料；

二、下星期准备一周，要圈出几个危险区，然后派出队伍去抓地震；

三、明天派一辆车到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中午时分，会议结束。

此时，距唐山地震爆发仅有15个小时！

7.2 “震中呢？震中在哪里？”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划破了黎明前的宁静！

惨案令人痛惜地爆发了！

“震中呢？震中在哪里？”

北京此时，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被震醒，他以最快的速度从宿舍楼狂奔办公楼！

值班人报告：

北京附近几个地震台的测震仪，有的被震翻，有的记录出格，外地台的报告尚未收到。

震中，你在哪里？

最高决策部门也在焦灼地询问！

震后 1 个多小时了，但专门测震的地震局还没有明确知晓“震中在哪里”。

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呢？

5 点整，地震局决定：

地震地质大队、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队、国家地震局机关，兵分四路，赶赴东西南北方圆 200 公里范围，用原始的办法寻找震中！

6 点左右，电信局系统率先报告了震中之所在：

“震中不在三河，而在唐山！”

稍后，地震中测出震级——一开始是 7.5 级，后确定为 7.8 级！

一切都已经晚了！

7.3 不堪回首“7.28”

唐山是拥有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

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 53.8 秒，7.8 级的大地震震塌了唐山！

恶梦般的凌晨,却不是梦!

震中就在该市路南区的吉祥路一带,即北纬 $39^{\circ}38'$,东经 $118^{\circ}11'$,震中烈度达 11 度,震源深度 12 公里。

吉祥路不再吉祥!

极震区以唐山市为中心,向四面延伸,约 47 平方公里,灾害极为惨重。

唐山市的老区,多为老式单层民房,震后一片瓦砾。

新市区大都是砖混结构多层建筑物,也几乎倒塌殆尽;就是钢筋混凝土框架高层建筑物,也未能幸免。

铁路轨道发生蛇形扭曲,或由于路基下沉而呈波浪式起伏。地表产生宽大裂缝。桥梁普遍塌毁。

发震构造裂缝通过本区中部,延伸达 8 公里。在发震构造裂缝带附近,地面运动非常惊人。其两侧 200 多米的范围内,人被抛向空中。有的地段,后排房的屋顶依次落在前排房的房基上,衣物箱柜也被这样抛出。

这次地震的影响区域极大,强烈的震动波及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

北起黑龙江的满洲里,南至河南的漯河,东临海区,西抵宁夏的石咀山、吴忠一带,涉及 14 个省、市、自治区,2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几亿人受到骚扰。

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北起辽宁黑山、内蒙古多伦,南至山东德州,西迄山西繁峙、和顺,约 21 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严重破坏区 3 万多平方公里,区内农村民房大量倒塌、损坏,农田淤满泥沙,水渠,水井堵塞,公路、铁路、桥梁损毁。

1974 年 9 月建成通车的滦河公路大桥,长 600 米,宽 8 米,在 7 月 28 日下午的 7.1 级强余震后全部塌毁。

据统计,除震中区唐山市及天津市区外,这次地震中倒塌

房屋 350 万间，程度不同地受到损害的略少于这个数目，近 250 万间。

在这次大地震中，据唐山、天津、北京地区的累计，夺去了 242769 人的生命，重伤 164851 人！

7.4 “唐山来的，到国务院报警”

7 月 28 日凌晨 4 点 10 分。

一辆红色救护车悠悠之间变成了一辆特快邮政专递车！

车上载着四个值得在中国地震史上留下名字的人：

李玉林——唐山矿前工会副主任；

曹国成——唐山矿武装部干事；

崔志亮——唐山矿矿山救护队司机；

袁庆武——唐山矿机电科绞车司机。

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空间里由这四位普通群众组成了一支十万火急的送信小分队，几经曲折，星夜兼程，“杀”奔京城！

李玉林后来回忆说：

救护车在距新华门 10 米的地方被一个警察拦住了。

“干什么的？”警察问道。

我说：“唐山来的，到国务院报警……”

早晨 8 点 06 分，李玉林一行 3 人终于进入中南海！

“首长啊，唐山全平啦！”李玉林哭一样地喊着。

如五雷轰顶，恶讯震惊了紫光阁的神经中枢！

中南海好似又发生了一次强震！

救死扶伤的紧急行动开始了！

8 点 06 分，河北省第一书记刘子厚和煤炭部部长肖寒奉命立即乘飞机赴唐山；

10 点整,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民率领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

11 点左右,河北省委、省军区先头人员到达唐山;

12 时许,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选进、副政委万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乘飞机到达唐山。

下午 2 点,3 架飞机载来沈阳军区指挥机关人员和辽宁省医疗队。

下午 4 时,5 架飞机分别运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赴唐山……

7.5 生命大营救

一场罕见的生命大营救拉开了帷幕!

200 多支医疗队,1 万多名医护人员在唐山废墟上开始了殊死的战斗!

7 月 28 日下午,天津汉沽已搭起了救死扶伤的帐篷。

7 月 30 日,国务院决定将唐山伤员向全国 11 个省(市)转运!

兵贵神速!

截至 8 月 25 日,共计 159 列(次)火车,470 架(次)飞机,把 100263 名伤员运往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和上海!

从 7 月 28 日至 8 月 12 日半月间,唐山机场在极其艰难,受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起落各类飞机 2885 架次,最多的一日一天 354 架次,平均两分钟起落一次,密度最大的时刻,间隔仅 26 秒。此间,仅 7.8 级地震后 48 小时之内,3 级以上余震就达 900 多次,其中 5 级以上强余震 16 次!

据此同时，地面的救援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据载，唐山震后，军队、地方参加救灾的汽车高达 2 万辆。

——地面“部队”把大量紧缺物资、食品及时地运往灾区，送达受灾群众。截至 1976 年底，共运输：

粮食：7611 万斤；

饼干点心：3644.7 吨；

食糖：1230 吨；

肉：947.1 吨；

蔬菜：1406 吨；

衣服：157.3 万件；

鞋：41 万双；

炊事用具：528.7 万件；

火柴：6110 箱；

洗衣粉：32 吨；

药品：293.7 吨；

苇席：262 万件；

草袋：255.6 万个；

木材：897.3 万根；

毛竹：101.4 万根；

铅丝：1000 吨；

铁钉：1030 吨；

油毡：86.51 万卷；

石棉瓦：36.45 万片；

塑料布：1043 吨；

……

——7 月 30 日，北京重型电机厂用改装的 30 辆水车将

清泉及时地运达灾区；31日，上海急调飞机运来12000米水龙带……

——7月28日，北京派遣两台发电车，当晚使抗震救灾指挥部亮如白昼，有力地保证了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30日，市区水源地、机场和开滦煤矿电路开通……

——7月29日，辽宁邮电系统维修队成功修复了东北三省经唐山通往津、京的电话线……

——8月7日，铁道兵部队以神速修通了京山线……

——截至8月10日，参加救灾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共计10万人，包括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海军、铁道兵、工程兵等部队；共救出群众12245人……

——据悉，由于情势紧急，决策失算，“派去和灾害搏斗的军队，事实是一支没有武器的赤手空拳的军队”。7月28日下午，某营在救灾中有2/3的战士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这些紧抿双唇的无言的年轻人，奋力地，然而几乎是徒劳地用他们的血手扒开坚硬的废墟。”就是这血与火的殊死搏斗中，该营战士扒了一整夜，扒出了76具尸体……

……

这是中国抗灾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

这是人们感伤忘怀不忍提起的一幕！

这是中华民族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幕！

7.6 形形色色的受震者

在地震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转瞬间的生死并无法“区别对待”精神的高、寡者和物质上的富、乏者。

但受震者心态却是瞬息万变、形形色色的。

镜头一：7月28日的剧震，将一对年仅24岁的夫妇——陈俊华、郝永云带入了另一个昏暗的世界——楼的最底层，倾斜的天花板离他们仅有几寸远。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3天的抗争。“我（陈俊华）把四周都砍遍了。石头、钢筋、水管、暖气片……菜刀卷刃了，变成了一块三角铁。我一共凿开了七、八个窟窿，全都是死路。我也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少时间”……“我寻思这会儿大概是第二天了……地震刚震那会儿，我怕头顶上那块天花板再落下来，用很多砖块垫住了它，这会儿，我却想把砖块抽去，任楼板压下来，两人一块儿死算了。”“整整两夜三天呵。那会儿要死也真死了。”“我想，刚结婚就砸死了，爹妈该咋想？两口子就死一堆吧，只是坑了爹妈。真舍不得死啊！”30日下午6点钟，人们循着勉强听得到的敲击声救出了这一对年轻而执着的生命。

镜头二：7.28的剧震震塌了唐山市看守所扯着电网的大墙！监狱一片躁动……经过一番非常性的紧急磋商，一支由囚犯们组成的特殊的抢险队伍宣告成立。作家钱钢描述道：“囚犯们和所有在废墟上的救险者一样，手忙脚乱，焦灼万端。他们似乎都已忘记自己的身份，他们和所有的救援者一样，小心翼翼地抱出那些受伤的孩子，扶出那些吓呆了的老人。每当扒出遇难者的尸体，都忍不住发出轻轻的叹息。豁出来了！他们拚尽全力在撬，在搬，在扛。满手是血痕，满脸是汗水雨水和成的泥浆。”……

镜头三：唐山宾馆在7月28日凌晨经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驻留唐山宾馆的外宾蒙受巨大的震撼。人声鼎沸，哭喊声尖叫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唐山市外事办展开了“国际营救”的大举措。据载，8月1日，丹麦格陵兰地区教师访华团19

人安全离开唐山；法国法中友协第6访华团23人除1人在唐山遇难，其余安全脱离震区，经香港回国；援助唐山陡河发电厂建设的9名日本技术人员，有3名震亡；共有51名外国人在唐山亲眼目睹了这场举世罕见的大地震。在他们优先乘机离开唐山时，他们以特有的表情紧紧握住中国救援者的手，动了真情地问道：“你们自己的家人不知怎么样？”……

突如其来的巨震令唐山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们经受了眼花缭乱般地相同的心灵震颤！

7.7 魔鬼的笛声犹然蜂响

残忍性是魔鬼的第一属性。

罪犯相中的更多是月黑风高夜。

据载，地震期间，被民兵抓住的“罪犯”共计1800余人！

这些“罪犯”共抢劫了：

粮食：670400余斤；

衣服：67695件；

布匹：145915尺；

手表：1149块；

干贝：5180斤；

现金：16600余元人民币。

镜头一：7月29日，在一片废墟中，一家商业厅奇迹般地屹立在凄风之中。突然，一部分劫后余生却又思趁火打劫者疯拥而至，开始了疯狂的哄抢，自行车、手表、收音机、衣料、食品在短时间被抢砸一空！

镜头二：这是一位人见人怜的白发妇人，人们看见她匍伏在一具男尸面前，痛苦失声，一声“我的儿啊”喊得人心碎，不

忍睹。但等人们过去,老妇的哭声却戛然而止,眼睛开始放出极为贪婪的目光,她以极快的速度摘掉了这具男尸的手表,即速离开,又扑倒在另一具年轻女尸身边,丑剧再次上演……当识破其真相的民兵将其扭住时,竟发现老太孱弱的手臂上竟缠了 10 几块手表!

……

在人类生存的空间,到处都存在着深刻的二律背反——鲜花盛开在大地上,恶草也在滋长!

7.8 国际地震预测界的震荡

唐山大地震使国际地震预测界感受到了十分罕见的震荡。

天涯此时,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警钟长鸣”,阿拉斯加州上下跳动了大约 1/8 英寸,搞得全州震动,人心慌慌!

同日,美国全国地震情报中心急电:

“中国北京东南 100 英里发生地震。”

美国地质调查所发布震情报告:

“北京东南约 100 英里,北纬 39.6°,东经 118.1°,在天津附近,发生 8.2 级地震。”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报告说:

“中国发生 7 级以上地震,震中在北京附近。”

美国夏威夷地震台宣称:

“中国发生 8.1 级地震,震中在北京附近。”

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地震台发布新闻:

“中国发生 8.2 级地震。”

美国檀香山地震台测得:

“中国发生 8.0 级地震。”

日本气象厅宣称：

“中国发生 7.5 级至 8.2 级地震，震中内蒙古，即北纬 43°，东经 115°。”

日本长野地震台报告：

“中国发生 7.5 级地震。”

瑞典乌普萨拉地震研究所测得：

“中国发生 8.2 级地震。”

美国里氏震级发明者里克特宣布：

“中国发生 8.2 级地震。”

香港英国皇家宣布：

“中国发生的地震为 8 级左右，震中：东经 118.1°，北纬 39.6°，距唐山极近。”

台北“中央气象局”宣称：

“阳明山鞍部的地震仪测到大陆北部的强烈地震，规模为 8 级。震中在北平东部 135 公里附近。”

同日，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宣布：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 月 28 日 3 时 42 分发生强烈地震……”

一时间，唐山这陌生的名词飘扬过海传遍环宇，中国——唐山吸引住了全世界的目光！

7.9 “中国拒绝外援”？！

1976 年，是中国政治空气极为紧张的一年。

单纯的意识形态原则和绝对的自力更生原则，使中国没有作出寻求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设想和行动。

——美新处华盛顿7月28日电：盖茨大使报告说：在北京和天津发生地震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美国人都安然无恙。盖茨已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但他没有说中国人是否已接受这种表示。

——路透社联合国7月29日电：“在中国东北部发生地震后，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在给华国锋总理的电文中说：这个世界组织准备帮助灾区人民为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

秘书长在启程去维也纳度假两周之前不久从日内瓦拍发了电报，他向中国人民表示他深为痛心和同情。

——美联社7月29日电：外交大臣克罗斯兰今天在下院宣布：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后，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

克罗斯兰说，我们准备尽力帮助。他要议员们放心，在这场灾害中英国人没有任何伤亡。克罗斯兰说，我们驻北京大使馆已奉命向北京当局提出：我们是否可以提供什么帮助？他说，英国王等待着答复。

已故的温斯顿·邱吉尔勋爵的孙子，在野的保守党党员温斯顿·邱吉尔建议立即提供援助，包括派一支工兵部队去帮助重建水的供应。

克罗斯兰说，过去发生这种灾难时，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克制的，不希望西方大肆声张地要提供援助。

——时事社东京7月30日电：官泽外相30日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于中国大地震，我国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这个报告得到了通过。”

外务省今天已动手准备发出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外相还指示孝川大使，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旦中国方面作好

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

——美国《新闻日报》7月30日发表社论,题为《中国是不是太骄傲了点,以至不愿意求助?》,社论指出:“关于中国北部地区本周遭到的地震,最令人可怕的事情之一是,中国人民和外界对地震造成的影响了解的如此之少。毕竟这不是在土耳其或危地马拉偏僻的角落里发生的事情,同美国相比说,大致相当于对一次强烈地震震动了纽约和华盛顿也许还使费城遭受破坏的地震实行实际上的新闻封锁。尽管如此,中国通讯社报道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使人几乎不容怀疑,一定需要做出巨大的救灾努力。中国决心自己解决它的问题,这种决心不应妨碍它接受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提出的美国提供援助的建议。”

——同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发表社论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地自力更生,这是他们的民族风格。但这是一种宜于进行超越政治和国际合作的情况,希望他们将不感拘束地加以接受……”

——路透社东京7月30日电:中国外交部今天对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说,中国谢绝外国因华北东部地震而提供任何援助。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抗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

——8月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专稿,题为《中国拒绝接受援助的原因是强调自力更生》。文中认为:华北大地震的后果令人毫无疑问地证明,中国人认为他们受到的灾难是他们自己的事,不用别人管闲事。他们所以持这种态度是由于昔日受过耻辱,由于民族自豪心和恐怕产生依赖思想。看来,最坚决地献身于中国革命的那批人,以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

方式,把这场革命看成了一场非常之长的战争……”

——1986年,当年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迟浩田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郑重指出:“那是我们的失策啊”,“但那时我们谁意识到了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在我们的帐篷里,他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件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要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

时隔15年之后,中国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中国政府及时的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寻援信息……

自然的灾祸常成为人们的学问。

八、扬眉剑出鞘

——“四五”运动纪实

林彪的折戟沉沙，使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于狂热之中猛醒；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更使“中华何处去？”的硕大问号象黑云一般压在贫弱的中国人民身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1975年的整顿再次强烈逆转……

人们从希望到失望乃至最后的绝望，积聚的怨愤象迸射的火药呛满了龙年的天空，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肃杀景象！

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沉默终于在龙年的清明节不可阻遏地爆发了……

8.1 天惊一声雷，信时心已碎

1976年，中国多事之秋。

此时，中华民族的巨轮在不堪重负中痛苦的徘徊……

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的辉煌星光在似隐似现中归于沉寂——他带着对祖国前途的无比担忧，对未竟事业的巨大遗憾、对亿万人民的深深眷恋走完了他灿烂人生的最后一段里程！

巨星陨落，举世震惊；

江河动容，山川失色！

有诗为证：

“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

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

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神州顷刻间处于一片沉痛的哀思之中。

中华巨轮的航标再一次发生剧烈的震颤，中华之舟处在险象环生的强大激流中。

中华何处去？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中国有识之士慷慨悲歌，忧心如焚！他们击节唱道：

“神州欲变，风雨已迷天。

昏星暗月，红日当空已难显。

.....

姐妃想统赤见，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1976年，中国多难之秋。

人们飘在悲痛的苦海里，由那着阴郁的风，来自凄凉之岸

的风，打个不停。

希望和忧虑是分不开的；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忧虑；没有忧虑也就没有希望。

正是希望的火种燃发了由悲哀、忧愁合成的导火索！

积聚已久的乌云终于迸射出悲壮的抗争之光！

沉默中，“四五”运动的序幕被拉开了……

8.2 来自四面八方的怒吼

风在起，马在啸，黄河在咆哮！

人在哀，民在愤，长江在沸腾！

2月13日，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中山路仓库的汽车司机何庆华，从北国冰城哈尔滨射出了一支直向“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利箭”——《致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一封公开信》。信中仗义直言：“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利用窃取的重要岗位，把自己伪装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镇压，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你们北大、清华大批判组，“遭到全国人民唾弃。”

2月23日，福建省机械局刘宗利在福州市贴出“吃了豹子胆”的大字报，题为《“阿斗”的呼声》。文中历数了“四人帮”的六大罪状，震惊福建，波及全国。3月8日，王洪文下令“严厉调查”。

2月26日，福州大学机械系教师厉海青在福州市东街口贴出《天仙子·葬志》词一首，锋芒直指林彪、“四人帮”的逆行。

3月2日，武汉市贴出“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等

大标语；同时又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同时，武汉锅炉厂召开有 200 多人参加的大会，公开点名批判江青、张春桥。

3 月 9 日，贵阳制药厂李洪钢等 7 名工人，“斗胆”在贵阳市贴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并油印 80 余份，在郑州、长沙等地散发。文中极有见地地提出“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乃是我国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此篇大字报反映强烈，很多群众认为大字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并一致表示“支持这张革命大字报。”

3 月 11 日，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了《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文中忍无可忍地向国人呐喊：“我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张春桥是个坏人！万一他的阴谋得逞，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我杀头也甘愿。”拳拳赤心，溢于言表。几天后，赵大中再次不顾个人安危，写出了更为激烈的续篇！

……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

单个人的目光也许会是呆滞的、走偏的，但亿万人民眼光的聚焦从来便是雪亮的。

傲视人民的人必然被人民的傲视所打倒！

抗争的火种所渗发出的火药味已呛满了神州所拥有的空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已形成不可逆转的蔚蔚史观！

8.3 第一个风暴眼

风暴是不选择时间与空间的。

但每一次风暴都有其赖以发动的足够理由。

《文汇报》成为第一个风暴眼！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汇报》基本上受控于“四人帮”，成为他们的重要舆论工具。多少煽动性、策乱性的大块文章都出自《文汇报》之手，在宣传极左思潮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举国上下沉浸于无尽的悲哀之中。而“四人帮”则立马给《文汇报》的亲信下达手令：“宣传周总理只能低不能高”，其别有用心，路人皆知。在这道手令下，《文汇报》的“低调处理”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凡是描述或客观记录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悲痛怀念的词句一律删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散发近500多万份材料，公开点名攻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而上海的街道上更是出现了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和漫画！

——3月25日，《文汇报》的表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日，《文汇报》头版推出了“四人帮”亲信的力作——《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文中竟然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锋芒直指周总理和邓小平！

一石激起千重浪。

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文章见报以后数日，抗议声声翻作浪，《文汇报》收到的抗议信件、电报达 420 多件，抗议电话 1000 多次。

——人民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文汇报》胆敢炮打周总理，我们决不答应！”

“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反周总理的人是孤立的！反周总理的人，在政治上必然是短命的！”

“《文汇报》是谁家的报纸？”

“你们的后台是谁？请站出来！人民是不会宽容的！！”

“你们到底是在受谁的指挥？！奉劝你们不要跟着张××的指挥棒瞎跑！”

“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

四面八方的怒吼，使隐蔽在《文汇报》后的实际操纵者们打了个冷战，随之便是狂怒和大肆反扑。

——为《文汇报》的干将加油鼓气，并给予其“高度评价”，称其“经受了斗争风浪的考验”，勉其再接再厉……

——为别有用心的“用心”极力辩护。姚文元云：“编辑不删稿子，那就不要办报了！”王洪文狂言：“删掉总理题词（指总理给雷锋的题词）算个屁事！”张春桥则颇为霸道地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

……

《文汇报》引发的怒吼，演成了一股巨大的红色冲击波，激荡人心，深入人心！

8.4 南京，不可阻遏的呐喊

《文汇报》的举措无疑是对民意的强奸！

强奸民意的人必然被民意推倒。

江苏——总理的故乡，愤怒的呐喊已然不可阻遏！

山高的地方，风也大。

1976年3月24日下午3点，南京大学某系约400名教职员，踏着沉重的步伐，抬着亲手绑扎的花圈，前往烈士陵园，以其特有的方式凭吊人民的好总理。

3月25日，新医学院的数名教职工冲破重重束缚，在新街口贴出了“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的大幅标语，吸引了南京城千万双赞许的目光。

3月28日上午8点，南京大学数学系的400多名师生，不顾种种禁令，毅然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人们看到队伍前头，总理的大幅遗像高高扬起，慈笑依旧，音容宛在！遗像后面是由玉兰花组成的花圈，“光辉永照后来人”的横幅悬挂其间，整个阵容肃穆、沉重！队伍出发前，游行组织者——南大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李西宁神色严肃而又刚毅地说：“我们今天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前去悼念周总理，我们要造成强大的声势，让那些反对周总理的人看看，人民群众是不好惹的！”队伍抵达梅园后，李西宁又率全体师生面对总理遗像起誓：“向周总理学习！一定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我们的革命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3月29日，南大师生再擂战鼓，决意以血醒民。上午，他们贴出“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下午，南大师生组成20多个小分

队，将大标语贴遍了南京城的主要干道。晚上，他们又奔赴南京火车站，将一张张战斗檄文贴在一辆辆即将开出的列车上！

3月30日，一首题为《满江红——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词作令许多人交口诵吟，一掬心泪！

人们噙着泪水读着：

星陨东方，
天地咽，山河减色。
忍为民，赴汤蹈火，
心血沥绝。
开天辟地奠国基，
踪迹环球创伟业。
问六十春秋昼与夜，
可曾歇？
瞻遗容，泪不绝；
哭总理，肝肠裂。
化举国之哀，
坚持马列。
岂忍江山付东流，
那堪神州再溶血。
将遗愿早日化宏图，
此心切。

3月31日下午，一个直径多达2米的大型花圈，陡然呈现在鼓楼食品商店大楼的阳台上。阳光照射下，两句挽联夺人心魄。只见两幅黑绸，上面特书32个大字：“心血操尽革命伟业如巍巍泰山立寰宇，骨灰撒遍祖国山河似点点春雨润人间。”

3月31号下午2点30分，南京最繁华地段之一的中山

东路，一幅巨型标语在一幢六层楼的顶端直泻下来，只见上书15个大字：“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4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关会议，在王洪文等人的操纵下，错误地认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指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要求对已出现的大标语“全部复盖”，声称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错误的指令是难以收服人心的。

错误的认识是无法平息大风巨浪的。

抗议的波浪依然汹涌澎湃。

4月2日上午，“捣毁《文汇报》的土围子！”的巨标依然映入人们的眼睑；

同日上午7时，一篇署名为“万万千作词，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轰动了南京城。歌词寓意辛辣，文风苍劲，一语破的！

歌词如下：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妖为鬼蜮，必显灾情。乱党乱军，祸国殃民，尾巴高翘，始露原型。原名狸精（李进），化名蒋亲（江青），年方六十，实在年轻。奇装异服，迎接外宾，妖态百出，不得人心。攻击总理，手段卑鄙，蒋帮敌特，配合密切。欺骗主席，罪大恶极，狐假虎威，借助钟馗。鬼喊打鬼，贼喊捉贼，当年武斗，它是罪魁。有个同伙，妖法更多，名叫蠢翘（春桥），最会奸笑。两妖合作，收集喽罗，篡权计划，有纲有目。先夺舆论，伪装老左，谈古论今，蛊惑人心。侈谈什么，儒法斗争，儒家法家，根本一家。代表利益，剥削阶级，事过千年，远离现实。为其翻案，是何用意？无非想当，封建皇帝。自己复辟，不须放屁，打

击正直,排斥异己。濫用法权,施出诡计,既想遮天,又想盖地。激怒群众,四方奋起,千军万马,口诛笔伐。妖怪惊慌,却能变色,七变八变,本质不变。觉悟群众,岂能愚弄?揪住尾巴,决不放松。众志成城,妖有何能?即取其道,还治其身。学习总理,革命到底!奋不顾身,捍卫总理。总理遗志,定能实现,人们所向,共产主义。

4月3日,南京邮电学院师生置安危于度外,毅然贴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大标语:“同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反周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彻底追查!”“要发扬‘五不怕’的精神,坚持斗到底!”“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

……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京事件”。

8.5 不平静的紫禁城

还是那股风,还是那样猛。

暴风雨中,仍能听到紫禁城那颗无法平静的政治心脏在怦怦地跳动。

1月无尽的哀思,2月无涯的痛苦,3月无休的呐喊……北京失却了寂静!

3月19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敬爱的周总理献上了第一个花圈。

转瞬间,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人的海,花的洋,整个广场显得肃穆、沉重,一双双充满忧伤的眼睛好似在搜寻着什么……

花圈在无言地倾诉。

花圈上的挽联也在默默地交流着某种信息。

走进这肃穆的海洋,你随时都可以读到感人至深的诗(词)句:

——“敬爱的总理,您回来吧,我们日夜想念您!”

——“四个现代化刚刚着手,您怎么能离开人间?回来吧,回来吧!回来还去国务院。在那里把好人扶起,把坏人撤换!”

——“一生奋斗,为中华新颜;灰撒江河,换大地常春。”

——“九州埋忠骨,大地生辉,总理精神永驻;八亿仰英灵,民心承露,斯人浩气长存。”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思念您。”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天地一声雷,

地倾绝其维。

顿时九州寂,

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

欲言泪复垂。

听时不敢信,

信时心已碎!”

……3月30日,一幅悼词张贴在五四运动浮雕下面,引来人头攒动,吟诵不已。悼词中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您那和蔼慈祥的面容,您那光辉高大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是无法磨灭的。”“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您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我们决心学习您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

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誓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血战到底！”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您安息吧，全国人民永远怀念您。您的遗志自有后人继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极少数人对民意的压抑和肆虐：

——3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指令天安门派出所“把送花圈的单位、人数、送了多少花圈等汇总上报”。

——3月27日，北京市民兵指挥部奉命派员赶赴天安门广场“观察动向”。

——3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遣派便衣工作人员“以群众面目出现，把小字报、诗词记录下来，全部报告”。

——4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在公安会议上错误认为：“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

——4月1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等地张贴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干扰破坏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央可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

……

然而，就在同一天（4月1日），一篇战斗檄文张贴在纪念碑显著位置上，上书四句诗：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狂怒的暴风雨，它慰藉着不可欺侮的民魂，连同心中的悲伤也注入它那喧嚣的倾泻之中！

8.6 清明节前雨纷纷

随着清明节的逼近,广场的政治风云变得异常的急骤,不同势力的交锋开始趋向明朗化。

清明节前雨纷纷。

4月2日,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抵天安门广场。

4月2日,中科院109名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碑。上书:“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4月2日,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出动。

4月2日下午,“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主持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镇压群众的措施。

4月3日凌晨4点40分,王洪文亲自“驾临”天安门广场,在手电筒的照明下扫视了纪念碑周围的部分花圈和悼词。即后,王洪文匆匆回程拨通公安部亲信的电话训示道:“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将来破案。”

同日,天安门广场小雨纷纷,平添几分肃穆气氛。人越聚越多,花圈越摆越大,前来悼念的人已达几十万之众。

同日，姚文元把革命群众的许多大标语定为“反动口号”。是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同日，在细雨濛濛中，纪念碑北侧的旗杆上，一幅几十米长的黑地白字的条幅赫然入目，上书：“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条幅署名为“北京市西郊烟灰制品厂部分同志”。

同日，悼念、声讨之声渐烈，高潮迭起，不可阻遏！诗词佳句，充分显示了觉醒了的人民的的大智大勇！

有诗表达人民对总理的深切怀念：

“夜献黑纱星做花，
总理光辉煌照万家。
仰望遗像手捧起，
难眠长夜泪滴哒。”

有诗寓意直向江青：

“素纸黑纱含恸剪，
苍松翠柏和泪扎。
谁言献花是旧俗，
明朝她死定无花。”

有诗象利箭射向张春桥、姚文元：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姚），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有诗质问“四人帮”的狂言：

“谁说清明是四旧？

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祭奠我先烈；

今发禁令何理由？！

莫道《文汇》鬼火亮，

自有人民写春秋。

寄言魑魅慢猖狂，

勿学林贼把命休！”

……

同日，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小字报，在广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文中写道：

“历史在太空中逝去，也在太空中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在历史上，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恶丧地叫着。在纪念碑下，当人们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幸灾乐祸，欣喜发狂。”

“细看这几只乌鸦，大概有三只，后头还跟着一团苍蝇，形成一大团黑色的妖雾。”

“这几只乌鸦为了各自的私欲，争夺着，把孔雀那漂亮的羽毛插在自己身上。为首的插得最多，头上、身上、尾巴上有条理地插满了。满口漂亮的马克思主义，好似理论家，实为阴谋家。这个乌鸦的后头紧跟着一只母乌鸦，她倒显得大方，不

要漂亮的孔雀羽毛，她要连衣裙，小西服，手腕挂的小白皮包，妖里妖气，实为魔怪。跟她并排的还有一个，让利欲熏着鼻腔，在《文汇报》上策划阴谋，喂得渐胖。后头还跟着裹着香粉的苍蝇，在清华盘旋，在那里下咀生虫。”

“历史那容这团妖雾横行。人民将把这些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在纪念碑前，在人民的怒吼中，无情地判决他们——一小撮民族败类！”

“历史永垂的纪念碑，在地球上向着太空，发出了雄壮浑厚的声音：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那一小撮妖雾，那几只乌鸦、苍蝇听到没有？还不快下台滚蛋！”

……

韩志雄的举措当然引起了“便衣”的注意。晚 10 点多钟，韩志雄在取自行车准备回家时被捕。至此，天安门广场被抓的群众已达 26 人。

真正的较量开始了！

8.7 异乎寻常的清明节

4 月 4 日，龙年的清明节。

4 月 4 日，不寻常的清明节。

这一天，约有 200 万人云集广场；

这一天，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有诗为证：

“清明的花圈如皎月，

嫦娥感慨同悲切。

清明的挽联象尖刀，
忠魂挥舞断贼腰。
清明的檄文放光彩，
进击大旗长空摆。
清明的诗歌披彩霞，
革命事业露新芽。
清明的歌声连广宇，
国际战歌不断曲。
清明的口号震乾坤，
人民永将正义伸。”

是日上午，北京铁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门广场
披展血书，上书：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
誓死捍卫您!!!

中国无产阶级的
红后代

场面感人，壮怀激烈！

上午7时，青云仪器厂职工，排成四列纵队，共275排抬着34个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同时，曙光电机厂3000多名职工从东单出发，走进广场。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也把他们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抬进了广场……

上午11时，首都钢铁公司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声泪俱下，感人至深：

“阳春3月的连绵雨水，那是我们8亿人民流不干的眼泪。”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慈祥的父亲！”

“您忠诚的儿女看望您老人家来了！”

“我们的好总理呀！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大义凛然、横眉冷对；对人民父亲般地关怀，母亲一样的热爱。”

“您老人家光明磊落、胸怀宽阔、任劳任怨、从无倦态。您一辈子工作、战斗；战斗、工作，不辞辛劳，不分昼夜。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您老人家是活活累死的呀！”

“您老人家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我们8亿人民心中！您老人家高大的形象，永远树立在人民心中！人民心中的纪念碑，永远砸不碎！人民心中的形象，万代放光辉！”

“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总理得人心，人民热爱总理。这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同志们，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垮！”

同日，纪念碑东侧贴出《叫人怎么办？》的诗词，为邓小平的不平遭遇公开辩护。

词中写道：

“8点钟上班，
点上一支烟，
倒上一杯水，
翻开一本大参考，
一看就一天。
生产上不去，
这是自然自然。”

自从去年‘七一’后，
面貌大改变，
领导下基层，
抓纲又抓线。
任务明确方向对，
群众心里好喜欢。
加班又加点，
卫星上了天。
结果好话没听见，
坏话一大篇。
什么‘人头要落地’，
却成了大灾难。
这叫人怎么干？！
是不是不干才喜欢？
不，
他们想一手来遮天。
3人10只眼，
阴谋篡大权，
唯恐天下还不乱。
同志们，
怎么办？
我们就要和他们顶着干，
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同日晚9时，纪念碑东南角出现了《第11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引来众人的围观。

有人在高声诵吟：

“江青（在1974—75年间）扭转批林批孔运动大方向，企

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

“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

“江青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1975)，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

文中直接点出江青的名字，引起了强烈反响！

……

4月4日，广场上佳作迭出，欢声如雷，中国的新诗歌运动在这特有的政治环境中不可阻遏地诞生了！

是日，广场上的诗作有以下几首传诵至今的代表作：

——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写下了《扬眉剑出鞘》的名作。诗中写道：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北京市外贸局青年干部李舟生写下了《今日在何方》的名作：

“请你们不要问我
今日在何方；
难道你们能不来到
这天安门广场？
请你们不要再费心
到这儿来找我，
这里早已经是
人的海洋。”

象四海惊涛

齐奔向英雄碑下，

象五洲风云

齐飞向总理身旁。

象无数白帆

满载着圣洁的情感，

我也扬帆催发呵，

航行在这无边的海洋。

.....

——北京电子管厂供应科干部丁长江写下的《清平乐·敬悼周总理》的名词：

“海倒山排，

天下啼恩来。

花甲益民劳功迈，

一唱旗赤寰白。

信步龙潭虎穴，

识斩妖魔狼豺。

今会马列同戈，

后人万世常怀。”

——《颂杨开慧》则是一首锋芒直逼江青的名篇：

“升月忠魂若有归，

不着奇装身心美。

文攻直刺投降派，

俯首人民不武卫。

风中青草乱俯仰，

骄杨挺立壮巍巍。

神州且为忠魂舞，

高歌一曲送开慧。”

——一首《几个小丑嗷嗷叫》的儿歌也为人们所传唱：

“蚍蜉撼大树，摇又摇：

‘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嗷嗷叫。’

——《清明悼总理》声声入耳，震人心魄：

“敬爱的周总理，

您的儿女对不起您，

您的英灵至今不能安息。

掏尽红心，

难表我们对您的深切怀念；

挥尽血泪，难倾满腔悲愤思绪。

您的一生历史已作出最高的评价。

功高日月，声震环宇。

国际史上，

永载您的音容笑貌；

革命路上，

踏遍您的稳健足迹。

风云涌，鬼神泣，

巨星一陨天地哀，

四海五洲下半旗。

可笑群魔不自量，

妄想重翻腥风血雨。

鼓唇摇舌，捧裙牵裾，

猿猴沐冠，什么东西！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让那些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总理精神万代传，
子子孙孙举红旗。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岗举义旗。
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安息吧，
敬爱的周总理。”

.....

在这悲壮激烈的气氛中，一张巨大的黑色潜网也在形成。
同日，“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羽亲自去广场布置“取证”
和侦察。

同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

同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进行紧急部署，要求做到“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暴风骤雨就要来临了！

8.8 4月5日：200人被捕

4月5日，是狂风暴雨的一天。

一场大对峙、大较量、大搏斗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了。

凌晨1—2时，广场上花圈惨遭践踏和洗劫。

此间，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出动200辆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烧毁，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留下当做“罪证”。

在清理广场时，57名在场群众均遭审查，其中7人因抄诗或“可疑”而被捕。

5时10分，王洪文来到联合指挥部小楼面授机宜。王洪文对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干将和总指挥部的成员说：“这两天广场实际被人家占领了”，你们要“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4日抓了3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看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干一场就干一场。打伤了民兵和民警，我到医院慰问去。”

5时15分，通往广场的路口已有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还设了劝阻站。纪念碑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的封锁线层层围住。

6时许，北京市172中30名学生，在群众的支持下，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

7时半，一名军人发表反对群众送花圈的讲话，受到群众

斥责。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引发众怒。两个“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其中一人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外，一时间集聚了10万之众！

同时，联合指挥部开始往大会堂东门增调民兵、警察和部队。

8时，一辆广播车在向广场群众作宣传：“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被激怒的部分群众，奋起砸扁了喇叭，推翻了车。

9时，一个持有清华大学机械系听课证的人公然攻击周总理，说什么：“你们这不是胡闹吗？人民万岁的口号不对，人民也分阶级。”“这样悼念不好。人一死，送花圈有什么用？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此言一出，群情忿怒，几名群众一拥而上，将其扭送至中山公园派出所。

同时，几十万人在大会堂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同工人民兵和警卫战士发生冲突。

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小灰楼），群众派出4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

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

下午3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

同时，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一个营，警察80人，民兵200人，加强了小灰楼的警戒。

下午5点04分，部分群众冲入楼内，小灰楼被群众点燃

起火。

下午5点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楼南面窗户爬出，撤离了指挥部。

同时，联合指挥部研究“反击”部署，决定在中山公园成立一个新的指挥点，下令晚上“要准备武器，可以带棒子、铐子”。

晚6时25分，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晚7时许，民兵5万，公安干警3000、卫戍部队5个营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28中学等地待命。

晚9时30分，《广播讲话》声伴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广场上空蜂鸣，200多名群众被捕，并投进监狱！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第五不准打人和骂人”的歌声依然雄劲的时候，数百名群众却正在遭受棍棒的击打！

4月5日，悲壮的一日！

一位诗人用血和泪记录了这悲壮的一幕：

“四人帮”开动了

封建法西斯的杀人机器，

狰狞的棍棒，

森严的枪刺，

向着赤手空拳的人群，

渐渐合拢，

步步进逼。

我的朋友，

怎能想象，

你，

我儿时的顽皮伴侣，

竟会血肉模糊地倒下，

向谁控诉？

向谁抗议？

从你滴血撕裂的肺叶；

叫出了尖锐的呐喊，

打倒法西斯，

还我社会主义！

8.9 寒风中的挺立

4月5日，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

看那荒凉凄惨的境地，周围是恐怖的暗窟，如烈焰燃烧的

炉，且火焰无光，所见的黑暗肆无忌惮地发泄着这灾祸之相。

不管黑夜多么漫长，

黎明总是要来临的。

但黎明前的天色往往是最黑的。

4月6日上午9时10分，北京海淀区感光材料厂的近30名工人送来这一天的第一个花圈。当他们走近天安门广场时，映入他们的眼睑的却是广场上的斑斑血迹……

晚6时，数十辆卡车载着工人民兵开进天安门广场。“广场一片沉寂，有百余群众在纪念碑前徘徊，没有人发出声音。纪念碑北侧那个唯一的花圈，不屈地在寒风中挺立。”

晚7时，天安门广场戒严，警察开始冲洗地上的血迹。

……

8.10 最高中枢的决断

4月7日上午8时05分。中南海游泳池旁边的一处宅院。

巨人毛泽东已处于他辉煌一生的最后一段岁月。

此时，他勉为其难地躺在床上。帕金森病综合症已使他话不能说得很清楚。皮肤没有皱纹，但病容使他脸呈腊色。他的脸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锐敏，但又是茫然的。83岁的老人以他的病夫之躯仍然在主宰着中国，但他已力不从心了……诚如他晚年作的一句诗所言：“风雨竹下奇儿在，古角灯前老泪多！”

“联络员”毛远新正在向毛泽东汇报天安门事件的进展和处理意见。

汇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作了下面几点说明：

第一，“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第二，“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第三，“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8.11 华国锋升迁“二号人物”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两个决议。

第一，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第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决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8.12 天安门，不相信眼泪

4月7日后，恐怖依旧，中华巨轮在剧烈地颤动！

4月7日，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有20余辆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打扫“卫生”，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紧闭，门外放着一块木牌，上书：“因修理内部，暂停开放”。

同日，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4月5日发出的《紧急通知》说：“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同日，“四人帮”在公安局的亲信在市公安局会议上扬言：“已抓到的还不是大鲨鱼，更深下去，捞一大批”，“重点在党政

军、党内走资派。”市公安局电话通知各分、县局，在照相馆查到凡涉及天安门事件的胶卷和冲洗的照片，要没收并登记姓名、住址或工作单位。

同日，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致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出了“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的正义呼声，结果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

至 6 月 17 日，经过“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亲信的挤力追查，共搜集了诗词、悼文原件 583 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 10.8 万件；从中选取重点 600 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它“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的共 1984 件。连同天安门事件共拘捕群众 388 人，至于以隔离、办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则更多，仅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就数以万计！

8.13 更为猛烈的“批邓”

“四五运动”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稍微醒过神来以后，他们对关于邓小平“一批二保”的处置极度不满，于是，他们又集中火力开始起劲地“批邓”。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袂发表《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10 周年》的文章，试图掀起一股批邓的飓风！

文中写道：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挂帅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邓小平妄图把它作为今后长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一声整顿令下，翻案妖风骤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一律都要‘整顿’掉。所谓整顿，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今年年初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前进的十年，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

……

此后一段时间，极左思潮肆虐中华，在“四人帮”的强制命令下，从中央到地方以至生产队又刮起了一股“批邓”风……

8.14 千古奇冤，冤冤有解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它们罪恶的疯狂终于画下了句号！

诗人在欢唱：

“驱散乌云，欢迎你，黎明，
把忧伤与夜一起送走，
甜甜的微风轻拂，云雀在啾啾啾鸣，

齐声向我的人民问候！

1978年11月15日，历史终于揭去了虚假的尘封，向世人昭示了“四五”运动的真相。

是日，新华社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且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昭雪。

.....

四五运动的革命精神光照千秋！